

中共党史资料丛书

南昌起义

(资料选辑)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K263.1/8

南昌起义

(资料选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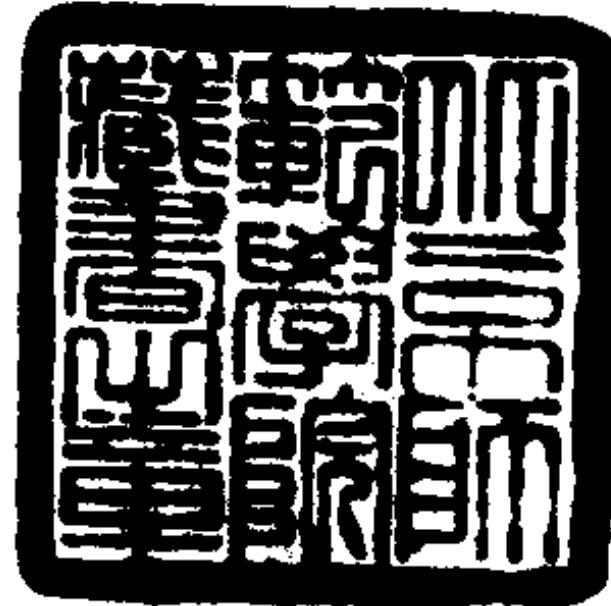
中央档案馆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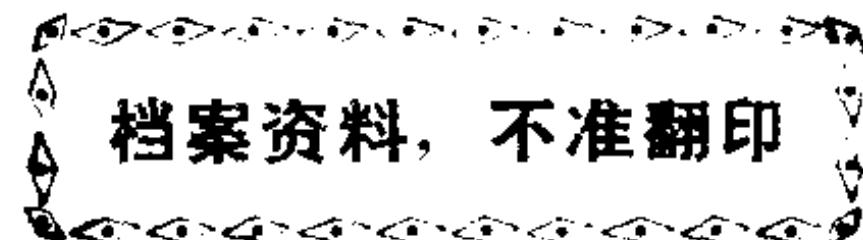


20837237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837237



南 昌 起 义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5 印张 100 千字

1981 年 10 月第 1 版 198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20,000 册

书号：3230·26 定价：0.40 元

内 部 发 行

出版说明

《中共党史资料》丛书，由中央档案馆编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史工作者研究和教学工作使用。选材多是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请注意保存，不要翻印。

为了保持文件、材料的原貌，在编辑过程中，一般未作文字改动。原件字迹不清的，以□暂代；个别需要说明的，另加注释。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难免有错，希望同志们提出意见，以便再版时改正。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十月

目 录

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信(一九二七年八月四日)	(1)
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信——向潮汕进军的问题 (一九二七年九月)	(4)
张太雷致中共中央紧急信——汕头的军事活动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6)
张太雷自汕头来信——关于汕头的军事活动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8)
张太雷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的 报告——“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	(10)
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为叶贺失败事件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16)
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 (一九二七年十月)	(27)
中共中央复张国焘的信 (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48)
附：张国焘致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扩大 会议的信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八日)	(49)

中共中央给朱德并转军中全体同志的信(一)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59)
中共中央给朱德并转全体同志的信(二)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67)
周逸群报告——关于南昌起义问题(摘要)	
(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	(69)
叶 挺：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摘要)	
(一九二七年)	(78)
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摘要)(一九二七年)	(85)
陈 恭：关于随军作战情况的报告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八日)	(112)
赵 誠：关于南昌暴动中二十军的斗争情况报告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117)
焦其恺：从广东回来的报告	
——“八一”南昌起义后行广东的经过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124)
张启图：关于七十五团在南昌暴动中斗争经过报告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132)
编后记	(134)

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信

(一九二七年八月四日)

德福同志：①

谢辉同志来汉所带各件均已接到。严同志来又接到组织、农民等报告，兹答复如下：

(1) 谢辉走时曾带复信，报告关于此间时局。并叫他到上海领取八千元作粤经费，是否已收到，请即示知。新预算一时不能确实答复，必须国际复电来。四、五、六月粤省经费，中央账上已有叫上海拨寄数千元，此事当待中央向上海查明。救济会本有一万三千元汇上海，恰巧远东银行被封，又生周折。

(2) 肃委事，因时局之大变而应注意者如次：1. 武汉政府已是反革命政府，不应再拥护。2. 武汉政府对各省党部已停发经费。对肃委当亦不发。3. 武汉政府已与李济深进行妥协。对肃委恐将认为敌人。4. 肃委中有汪、孙诸人的走狗，须防其谋害我们及告发密谋。5. 肃委可仍继续工作，但须对汪、孙派守秘密。6. 对武汉政府可

① “德福”是中共广东省委的代号。——编者注。

不理，进行独立的工作。旗子仍用国民党。7. 李品仙回桂事，与我们无利。况一时亦难实现。

(3) 组织报告，中央认为满意。

(4) 农民暴动的准备亦好，更须加紧。

(5) 其鉴、彭湃及大批同志由江西向粤边前进。绮园由海道返港，带有中央关于农民暴动的决议。

最近中央报告如下：

(1) 实行与武汉政府及汪、孙、谭等开战。此可于中央宣言等件看出。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无异。汪、孙等与蒋介石无异。武汉二月实行总罢工一天，反抗政府，武昌、汉阳完全达到目的，汉口方面完全失败，因防范太严，各小街两头各站兵二人。又由车夫领袖大批被捕，以致车夫复工。此次罢工本因车夫罢工而起，其他见车夫复工均不罢。我党在汉口工人中无基础为最大原因。广东根据中央宣言宣传攻击武汉反动，是汪已投降唐生智。

(2) 贺龙、叶挺军队已在八月一日早在南昌发动，已解决了六军、三军一部械。汪等本预备二日在九江开会，闻信回武汉发令讨伐贺龙、叶挺，并宣布共产党为叛徒，应明正典刑。张发奎态度如何未悉，惟他亦无法。我们原定计划是攻击朱军后直奔东江，中央昨日会议决令省委即刻以全力在东江接应。中央组织前敌委员会，指挥前敌一切事宜，以恩来、立三、代英、彭湃四人组织之，请设法与之互通声气以便进行。我们军事的成败在此一举，请广东省特别注意，并迅速进行为要。

(3) 鄂赣湘粤同时举行农民大暴动，其大纲已交绮园带上，鄂湘已着准备，湘南粤办亦有军事动作之准备，惜力量不大耳。

(4) 新国际代表已来，决定开紧急会议。此会议批评过去中央的机会主义及决定新的政策，广东太远而工作紧张，无法参加此会。想广东同志必能同意于批评。过去中央对湘事，及对国民党政策之动摇，因而致于失败，并且一定亦感觉到新的指导与方针之必要。议事日程如下：

1. 接受国际的最近训令；
2. 通过告同志书（批评过去的错误）；
3. 农民决议；
4. 工运决议；
5. 组织决议；
6. 新的指导机关。

(5) 中央暂留武汉交通处，在南洋大楼左侧永安里十二号找张启发，来人先须住店，再来找，以后再交文件。粤汉交通，至少要二人，除谢辉外，请找二人来汉，由中央担负费用。中央名已改吴世荣，安中原取消。

世 荣①

① “世荣”是中共中央的代号。——编者注。

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信

——向潮汕进军的问题

(一九二七年九月) ①

中原兄：②

一、八月五日在南昌送汉之报告，收阅否？自此遂无法传递消息。报中所载多属造谣，兄等自亦无从取信。

二、现革会及十一、二十两军均抵汀州、瑞金之线，八月二十六在瑞金城外三十里与钱大钧部二十师战，获全胜。三十在会昌城外和钱大钧率领之全部共九团人战，击溃其全军。九月二号七军黄旭初、伍廷、扬华等三部共五团来攻会昌，复击退之。总瑞金、会昌两役，我军伤亡官兵，约近千数，子弹消耗亦多，本来沿途行军，因山路崎岖，给养困难，落伍逃亡重病之士兵，为数极多，经此两战，我虽胜敌，但兵员与子弹之缺乏，实成为入潮梅后必生之最大困难。

三、军情除报载（确否难断）外，余亦无所闻矣。只知钱大钧败后集其残部向寻邬、武平一带遁去，与我军由

① 原文无时间，此时间是文件登记戳上填写的时间。——编者注。

② “中原”为中共中央代号。——编者注。

汀杭入粤者成平行线。七军战败之五团或亦将追钱大钧之踵而入粤。汕头闻何辑五手中只一团一营，而何应钦则助以两团由甬开汕。此外李济深可用至东江之兵力不出两师，再多恐亦抽调不动。近闻黄琪翔有率兵回粤消息，报载已至吉安，不知确否？

四、我方目的在先得潮、汕、海陆丰，建立工农政权，如情势许可，自以早取广州为佳，否则，在潮、汕须一月余之整顿，子弹兵员之补充乃是最急。

五、政治上革会之组织已见报纸，其分部办事行军期中亦未停止。

六、我们现向中共要求数事：

1. 我军如已取得潮汕，望即由上海派一得力人来接头。
2. 革会至汕头后，当以国民政府名义办事，外交缺人，请派太雷前来主持。
3. 子弹及机关枪缺乏，请电知××能于外埠装好货物，一俟汕头攻下，在十日内即能运至汕头方好。
4. 兵员之补充，需大量招募费，请向××商借香港票或沪票四十万，此款如借得，请先集中于上海为要。
5. 如汕头攻下，请派得力人员尤其是军事人员前来工作为要。
6. 望电知省委另召东江潮汕工农响应一切，以巩固工农政权及其武装。
7. 去人陈宝荪，已发来往川资，望即以回信交其带来为要。

张太雷致中共中央紧急信

——汕头的军事活动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中夏兄即转中央局：

我军二十一到汕头，现已向梅县、五华、兴宁前进，黄绍竑六团前在会昌被我军××，现在平远集合，梅县现为钱大钧、何辑五部约××千人，×××××击破，则黄军与在河源之陈济棠×××联络，然后再决定××，黄军或以少数部队×××××而以大队进攻××。张发奎军已有两团到广州，其余在韶关、南雄，不到八千人，急待补充，苟我军一月内到广州，张军尚易击破也。××××潮汕×安×五×××，现决组织农军×师，已着手招兵，军队亦××大批兵来，请即派人赴湘招兵，由韶关来东江。子弹尚须大力补充，请即设法，愈快愈好。财政×成问题，×××××××××昨日开南方局会议，决议如下：国民政府名单暂不发表，等毛子来决定，因我来到汕时已决定成立国府××，决定平山主席，此事我极端抗议。南方书记大家要推我×××因特立有问题，同志对他动摇不满意，但我又必须回港省，他们坚决留我，但我如何能留呢？

我等毛子一二日内到即返，请中央迁来，不然恐要倒台，此事甚关重要。再各科工作人员，请即派来，惟要不腐败的。钱及政府问题速决定通知，湘鄂情形如何完全不知，请告知。汕头商人三日内交出十万维持伙食，但×××尚未开门，拟用严厉手段令其开门。××反动派与农民斗争，军队不够分配，现仍叫农军自己想法给枪他们去打。顷接报告：飞鹰舰又进口来，未知有行动否。汕头口岸甚小也危险。敌军舰常在海口检查，请注意，并通知毛子。^①

① 文内有×处系按原稿排印。——编者注。

张太雷自汕头来信

——关于汕头的军事活动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我原来是决定到汕后一二日即返港，但因此间同志硬留，南方局决定我担任书记，昨日小洋人亦主张我暂留。他们要我留的理由是因为此间党已失重心，各干各的。平、国二同志均为同志所不满，恩来忙××××难顾及党的工作。南方局昨天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加入立三及代英，以绮园做秘书，请批准。决定通知平山离此赴俄。对于政府机关现时纷乱，××加以整顿。一切宣传须集中宣传委员会，并扩大宣传，详情可看记录，抄后寄上。中央最后即迁来我方能脱身。省委的指导工作非常重要，特别在我军接近广州时。各处的动作请快快来!!国民党的恢复已决定停止，至于如何改组军委等问题比较重要，须中央或国际代表来方可决定。速派财政、外交、军事、政治×××××有中国同志懂得银行或在银行做过事的都请派来，七九子弹要大批的，如上海可买先买来，多少来都是好的。我军直取梅县、兴宁，如胜，可击破李、钱两部的主力。张发奎、黄琪翔与我们吊膀子，互相派代表。但我们决没有幻想，

并且我们知道他们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在张军内部，我们现已稍有工作，广州暴动的准备积极进行。二十八日飞鹰等敌舰，因上岸被击退，现已开出口外，潮汕×××××
×谣言。反动派尚在各县蠢动。军队现集中故甚难×××
×农民有枪给农民军但无子弹。汕头有一子弹厂，原来可
出×××××被毁一部分，现用×××××××二千四
百粒，为数量少，但足供潮汕一带维持治安之用。政治警
察工作无成绩，因同志大都是外行，现由立三主持，请即
派老于来，余容再告。^①

② 文内有×处系按原稿排印。——编者注。

张太雷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 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

——“八一事件”之经过、
失败原因及其出路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

这个报告分开几方面说：

(一) 政策决定之经过

我们首先说明白中央决定南昌“八一”暴劫，是决定在四省秋收暴动以后。此时解释，要以农民为主力，去进行土地革命，并未丝毫依赖军事力量。后来南昌客观上容许我们动作，中央决定要动，但只认定南昌暴动是四省暴动中的一部分，仅仅是土地革命的一个帮助。希望军队到广东来，能够与广东农民暴动打成一片，绝不是希望单纯军事的胜利，因为这是没有意思的。在南昌开会的时候，平山同志主张干，但他主张干的原因说是：贺龙主张，叶挺也同意干，故他也主张干，这完全是军事冒险的运动。绝不是如中央决定去干的政策一样。当时秋白把南昌的决定

由浔带到汉口，中央已决定对张发奎的态度，如张不与汪精卫联络则到东江之后始解决之，否则在得便解决他。故赞成南昌的决定，并派恩来去主持。同时国际亦决定要干，内容详细我虽不知，但决定要干我是知道的。后中央又派国焘去，意思是要他去鼓动同志更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不料国焘假传圣旨，说国际不主张干，他亦极力反对干。此时反而平山主张暴动，成为拥护新政策的一个人。国焘这不仅损失个人的信仰，而且是损失中央的威信，因为他是中央派去的。故此次国焘的行动，实应受处分。因为这样结果致使这次运动成为平山所领导，自然这个运动也变成了军事的投机。

(二) 政治上的错误

这次军行所至，与土地革命毫无关系，未曾帮助农民有蓬蓬勃勃的斗争，沿途只知道叫军士怎样守纪律不扰民。可以说这次我们的军队，不是什么革命军，只算是王者之师秋毫无犯。不准军士抢土豪劣绅地主之财物，甚至鸡犬亦不能擅取，宁愿饿肚，还算在彭湃乡村中杀了几十人。我们军队到的地方，并没到乡村中去骚乱，杀戮土豪，闻在汀州捉了十人，亦只勒索数万元了事。到了汕头，更是沉寂，其情形闻之便要下泪。什么宣传、筹款、打反动派，一概没有什么。闻说曾招集了一个大会，标语传单不多。见警察就跑了，我们不知把工农分子去代替，反去找

回旧的，始有人站岗。至兵舰陆战队上岸那天，警察竟为内应，我们对警察还这样不忍杀戮，甚至至公安局的名义都不肯改为政治保卫团，这虽然很小的事情，亦足见他们保守观念太深。

各地农民亦没有得到军队的帮助，潮汕农民亦未动。同阳农民自动起来，亦只派甚少军队去援助。普宁城派了一营人，攻西城，军队竟从防军之要求，不准农民入城大杀土劣。农民是非常不满意，觉得我们的军队与其他军队没有什么分别。大家都以为把敌人打了克复广州，甚么问题都可解决了，遂不注意怎样趁军队力量所及的地方去负起帮土地革命进行之任务，这与国民党划分军政时期、宪政时期的观念错误是一样的。

(三) 军事上的错误

军事上的错误，亦是跟着政治上的错误而来的。譬如国焘不主张在南昌动作，因为是对张发奎有许多幻想。就是临走的前夜，亦与张发奎作很长的谈话，而且说还有希望。军事上的错误，在南昌动作开始的时候就有，就是对蔡廷锴部，过于相信，以为他不会背叛，迟迟不解决他，致被中途逃走，同时影响到二十军。不然，多了几千兵或不至有这样利害的失败。同时军事计划因为想急取广州，所以行军是很快的，沿途抛弃枪枝大炮无数，死人亦多，然后至会昌又折回，不由筠门岭入，以为给养困难，其实

并不是事实。裕叶去平远回来报告，筠门岭一带给养都可能的，这又当进不进的贻误时机，使敌人能够集中。

其次，军队中的侦探工作做得不好，敌军作战计划与人数完全不知，汤坑之后仍是乱摸的。还有，就是主力军不集中，二十五师竟调去三河坝，遂为敌人击断不能援救。总之，这次失败，是军事行动与东江农民没有联络，鼓起土地革命之高潮，与农民暴动打成一片。

(四) 我们应有之认识

此次的失败，很明白的告诉我们，单纯军事的投机，没有唤起广大农民起来，必然失败的。但经过这次之后，有些人根本会怀疑到农民，以为农民没有力量，这个错误观念，我们应该严厉反对的。

(五) 目前的方针

目前工作方针，与前大不相同的，就是以前还有些妥协存在：一、以前五十亩以下土地不没收的，这实在是土地革命的障碍，以后便一切地主（小地主在内）的土地都要一概没收，彻底的干去；二、以前还是用国民党旗帜去号召，以后便不要了，改用红旗。以前只限于宣传苏维埃，以后便要真正建设工农兵代表会。表面上似乎与前所差无几，实际已大大不同，就在换红旗一点看来，已表现

出我们的坚决。

我们现在要放胆去干，不应象以前太规矩，要平民式的干，不要有仁慈，打破好人的观念，对土豪应该乱杀，绝对不要恐怕冤枉了。我们必须接近新的精神，抛弃一切旧有的观念，甚至以前是很好。根据此政策，我们的工作是：

一、二十五师已退彭州，约二千余人，二十四师已到海陆丰一带，约有千把人，贺部师长已叛，但闻兵士脱离者数百人。我们现在要决定他们去做政治的流寇，不应象过去只注重掠夺政治经济的中心，他们每到一地，便要杀土豪劣绅。帮助农民起来便要组织工农政府，扩大宣传，我们不是希望一定要这个政权能够稳固很久。

二、军队一律改工农革命军，指挥在参谋团，实则直接受南方局指挥，不致再成为单纯军事投机行动，旗帜改红旗。

三、各地且仍应积极准备，有机会便起来。

四、革命委员会要改组，权属中央，名单更要中央决定。至各省要不要革委，由中央决定。至将来革委之产生，或可招集全国工农兵代表会，或某一种形式，其余各条，在目前工作纲领上面已有写出，现不重述。我们有个问题，就是以后是否还有希望，革命前途是否高潮？我们可以肯定说，是高潮的，有希望的。我们从主观方面说，自军事失利后，海陆丰农民仍继续的奋斗，打贺部叛军，十四日广州海员示威大运动，自动夺取工会，打工贼，至

海南农民占据五县，组织政府，现仍有占据全岛之希望，武汉湘农民仍旧在奋斗中。再从敌人方面说，全国已入混战局面，冯张之争，晋奉之争，唐生智与南京之冲突已明显，周凤岐、何应钦亦交恶日甚，李张因我军失利，而成李张黄鼎足而三之势，日在准备伙并之中。我们的失败，并未促成敌人的团结，反促成敌人的冲突。反一方面说，我们因这次失败使我们不再幻想单纯的军事行动，而知道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假使这次我们胜利了，前途可否乐观还是怀疑的。因同志中多仍充满旧的观念，党的力量又弱，同志中竟有争领袖的表现，胜利了恐也不是革命的胜利。

总之，我们得到了此次教训，必须抛弃过去的错误观念，彻底执行党的新政策，这样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

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

——为叶贺失败事件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一) 南昌暴动与南征的意义

南昌暴动的“八一”革命在中国革命史上有极重大的意义：从国民党改组以来，国民党的所谓革命，始终是扩大些在所谓“青天白日”之下的军事势力，全然不肯发动民众，使民众自己起来取得政权、取得土地，推翻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私有土地的制度；恰恰相反，当农民群众自己起来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时候，工人贫民自己起来民众的革命民权独裁的时候，这些国民党旗帜之下的“革命军官”立刻便攻击农工人，大施屠杀。蒋介石四月中的上海屠杀，广东屠杀，……是如此；湖南唐生智等的“马夜政变”及清乡，以及冯玉祥在陕豫的屠杀政策，也是如此。就此证明国民党的一切新军阀，都是代表豪绅资产阶级而反对工农压迫工农的。所以中央在宣布与国民党的武汉政府破裂之后，立刻决定民众武装暴动的新政策，规定湘鄂粤赣

的四省秋收暴动的计划。而叶挺军队的南昌暴动，便是这一民众暴动，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权之总政策中的一个计划。

叶贺南昌暴动，在一般的民众武装时期之中，占有何等重大的地位，这是非常明显的。民众自己的发动，以及真正革命军队的暴动，以推翻新旧军阀政权，建立民众的工农政权为目的，以实行土地革命为目的。——这历史的事实，是中国革命中空前的事件。所以现在叶贺虽然是失败，而南昌暴动在湘鄂粤各省工农武装暴动的总政策之中，始终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不但如此，我党以前的政策——是机会主义的政策，其错误的主要点，便是无产阶级政党抛弃独立的政治行动，侧重小资产阶级领袖妥协让步。只有决定四省民众武装暴动，以及率领叶贺军队暴动反抗武汉反动政府之政策，是算党抛弃机会主义而走上布尔什维克道路的新纪元。

因此，凡在南昌暴动之中，有倾向于犹豫摇动，如等待张发奎态度之表现等等的，显然是机会主义的遗毒；南昌暴动之后，只抱着军事投机的心理，而不信任群众，不认识发动群众，创造群众的工农政权之倾向，甚至于暴动开始之后，仍旧抛弃土地革命之旗帜，那就更是机会主义的遗毒。叶贺军事上的失败，不是我党真正的失败；只有南昌暴动中之指导不能完全脱离机会主义的遗毒，所使南昌暴动减少其历史上应有之意义——这可是我党政治上的失败。

(二) 叶贺南征的经过及其失败

南昌暴动后，叶贺军队从南昌经过抚州、瑞金、会昌，遇见钱大钧的及一部分黄绍竑的军队，与他们大战，结果，南昌暴动军虽然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是也打了很大的胜仗。会昌之后叶贺便未照预定计划直下寻邬，到梅县，竟改变途程折回汀州上杭一带，再经大埔一直往潮汕去。但是等到叶贺军队到潮汕，敌人方面陈济棠、王俊、黄绍竑已从四面合围来攻击。

叶贺军队虽然在九月二十四日先锋即刻到汕头，汕头工农军也起来暴动，然而到九月三十日即被反动军队所逼，不得不抛弃汕头，而竭全力到汤坑去御战。这最后一次战斗，敌人方面有一万五千，我军只有五千，巷战一昼夜而我军竟完全解体。现在的情形是：二十五师一千余兵因到汕头时尚留驻三河坝，不久即被敌军隔断，现在退向闽边。汤坑之战败后，叶挺只余七八百人退甲子港而溃散。尚有贺龙二十军之第一、二师二三千人奔往海陆丰，这部分的军官政治意识本甚模糊，离开大队之后，更是绝无目标的情形，竟要求李济深收编。

(三) 叶贺暴动失败后之政策

南昌暴动军的失败，诚然是中国革命中的一个失

败——工农武装暴动的开始时期，革命方面所有的这一些正式编制训练过的军队，不但不能争取广东发展土地革命，而竟溃散了一大部分，这诚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是武汉政府反动后，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更新的时期——工农民众暴动的时期，叶贺军队的革命战争，不过是全国民众暴动中的一个强大的副力。这新时期中，我们的主要政策是组织民众暴动，赞助民众暴动，叶贺的南征，不过是这总政策之中的部分问题。我党这个新的武装暴动政策，完全是合于革命发展到新阶段时客观上所要求的。只要看看九月初直到现在，湖北的通城、通山、崇阳、咸宁、蒲圻、公安、石首、松滋、江陵等县，农民甚至于徒手的暴动起来，组织工农革命军，占领县城，革命民众自己选出县政府，乡村之中实行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没收地主，杀戮豪绅……湖南、安源的工军和农军暴动进攻醴陵，株洲的农军以一支枪夺取株洲，平江、浏阳的农军曾同时暴动占领县城，长沙四郊的农民也起来暴动，广州则自四月十四李济琛反动后，四处暴动起来。但要看这种情形，但知道客观上革命的发展，的确已经到了一般工农暴动的时期。我党的责任，便是组织和准备以及赞助指导这民众武装暴动，在各地率领民众起来推翻新旧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

在这种总暴动之下，叶贺军队自然有很重大的意义，但是，革命的基础力量始终并不是叶贺的部队，而是工农群众。现在叶贺军队固然失败了，工农民众的力量还却正开展，对于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必要之认识正在与新旧军阀国民

党的剧烈的斗争之中，日益广泛而深入于工农群众——不但在两湖广东是如此，现在江浙北方豫陕……差不多各省都有如此的现象。这种情形之下，难道叶贺军队一败，革命便了结了么，当然不是的。叶贺的失败仅仅是军事上的失败。叶贺的军队可以给敌人打散，工农民众的力量并没有打散。我党准备组织发展工农武装暴动的总政策，仍旧应当积极的进行。

因此，现在广东虽然已经没有立刻以大军攻取广州夺得全省政权的可能，然而广东各地的农民暴动仍旧在发动，叶贺所剩余的势力应走“到农民中去”帮助当地农民摧毁豪绅的政权，建设农民群众的政权，引起农民群众自动的起来没收土地……武装农民，组织工农革命军，叶贺所余军队自身要改组，变成工农革命军。

(四) 叶贺南征中我们主观的错误

叶贺军队的南征，何以竟至失败呢？固然，客观上敌人的军力比我军强大，全中国的报纸交通整个儿的权力都在敌人手中。然而失败的缘因之中属于我们主观上的错误的亦是很大：

一、前敌委员会政纲的错误——主持叶贺南征的我党指挥机关，前敌委员会决定政纲之中，关于土地问题提出“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地主土地”的主张。这是非常之大的错误，这证明没有土地革命之决心，这种政纲可以使叶贺暴

动根本上丧失其意义。广东一个农民听见这一主张便说道：“这叫做耕者无其田”！这句批评是再正确也没有。

二、策略上的错误——叶贺南征军所到的地方，对于豪绅资产阶级所采取的策略，并不是猛力摧毁他们的组织和政权，都大半偏于犹豫妥协的策略。并未猛力歼灭土豪乡绅，并未完全解除他们的武装，摧毁他们的金融机关，摧毁他们的交通联络。不敢坚决的实行没收征发的政策，却用军阀筹饷的老办法，和他们和平磋商。对于豪绅是如此，然而一到汕头，对于乘机稍稍抢掠的贫民，都立刻枪毙了三个人，“为的是维持秩序”——那是还是维持的豪绅资产阶级的秩序！广东有一个工人说：“这是蒋介石第三的军队”。这就是说：这次来的军队还非工农贫民的军队，并没有大大杀灭豪绅资产阶级的权势与势力（叶贺军队之中“不扰民”的口号几乎高于一切）。

三、政权认识上错误——“耕者无其田”的“蒋介石第三的军队”到广东做什么呢？要创造什么样的政权呢？当然，带着这种政纲和策略的军队，对于政权不会有明了的认识。没有预备去建立工农贫民的政权，没有深切觉着自己应当代表工农贫民去行使权力。却只要“继承国民党的正统”。没有信仰群众的力量——群众的革命独裁的力量。没有在群众之中去创造真正自己的军队和政权的力量，而是想象着自己是一种军队的力量，类似于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国民党的国民政府的力量。因此：一、可以乱发委任状，联络杂色军队土匪首领；二、可以派人与张发奎谈判，

弄些纵横捭阖之术……

四、宣传工作上的错误——叶贺军队行军的时候，兵士之中并没有做充分的宣传及政治工作，所过地方的民众之中也没有宣传。同时，敌人的宣传都非常之厉害，军队行过抚州之南，差不多十几天不见一个人，这是因为朱培德等反宣传的恐吓当地居民的缘故，我军却没有先行派遣宣传，说明“八一革命”南昌暴动及南征的意义。

五、军事上的错误——军事上的错误，更是很多，不能详细叙述，简单些说：南昌暴动没有采取直下赣州吉安，一则可以打散朱培德、钱大钧，隔绝张发奎，使他们不能与李济深、黄绍竑连成一片，而如现在之从容布置，围攻我们；二则这条是大路，沿途农民运动有些基础，可以随处摧毁豪绅政权，引起农民群众建立农民的政权，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农民，逐步交农民防守。南征的路线是取得抚州、会昌、寻邬等闽赣边境荒微之地，农民简直尚未起来的地方，这已经是一个失着。然而这还可以说，仅仅是一种可能，最明显的是：一、开始便有与张发奎妥协之等待犹豫的倾向；对于不稳的部队，如蔡廷锴部，采取非常软弱的摇动的政策，致使蔡廷锴得以诈术损坏我军很多很好的部队。再则，现在瑞金、会昌打了胜仗之后，又不追踪南下，直到梅县，汇合当地已经奋起的农军，发动当地农民暴动，击散黄绍竑等敌军，直取兴宁、五华，占领全东江区域，却又折回走上杭、汀州，与敌人避道而行，使敌人得以腾出十多天的工夫从容布置。

总之一——前敌的指导，在政治上及策略上并未能真正代表工农，既没有明显的土地革命及工农贫民政权的政纲，又没有坚决摧毁豪绅政权的策略，——工农说是“耕者无其田”，“蒋介石第三的军队”。这种机会主义的指导之下的军队，如何能责备农民群众不起来援助，农民对于这种军队自然是不会出力赞助。事实是叶贺军队根本不去发动农民群众——前敌指导，只知道军队是主力，“革命委员会”是政权，根本上不信任群众的力量，不去发动农民创立真正的民众政权，因此将富有历史和伟大的意义之“八一革命”，变成仅仅是投机的行动。这是一切错误的总错误。总之，此次失败，并非农民未赞助军队而失败，而是军队未发动工农群众，甚至反而阻滞民众革命斗争而失败的，（例如普宁农民群众数万围城攻豪绅的巢穴，军队去帮助，打进了城竟反而不准农民进城，不准农民大杀土豪乡绅，说是维持秩序）。

六、南方局指导广东农民暴动的错误——南方局指导广东农民暴动的政纲战术上的错误，中央早有信去指正（见中央通讯第六期）。叶贺军队与广东农民接触之后，尤其见得出：（一）政纲和口号上拘泥规定五十亩以下不没收，另提减租至百分之三十的口号；（二）战术上农军只取侧面攻击——仅仅作帮助叶贺，牵制敌人之计，而没有号召农民群众自己起来夺取政权和土地，因而没有猛力搏击的战术；（三）根本上没有发动农民群众，所谓暴动，大半是，或是完全靠已经组织好的农军势力行动——或为纯粹

的军事行动，而不是农民群众的暴动；（四）地域上海南及高雷虽起，而无关大局，西江方面简直只接洽有枪的零星部队（农军或土匪），没有到群众中去号召，因此，这地方始终没有暴动，黄绍竑部队遂得安然渡过；（五）既没有把广东农民运动做主力，又根本没发动群众，所以使群众之中发生等待叶贺的心理。自然，一般工农自己没有深切知道自己起来夺取政权——这是政治宣传之大错误，就是我各地党部也没有详细考察反动势力，作种种夺取政权的准备，——这是技术工作上的缺点。

（五）叶贺失败所得的教训

前敌委员会及南方局的政治上的错误，虽然最后改正了些，——例如土地问题、政权问题等等，但是已经太迟了，那时军事上已经近于失败了。叶贺南征中我们所得的教训是非常之大的：

（一）政权问题——今后革命的任务，应当明显的确定是要创工农贫民的革命独裁的政权——苏维埃的政权。国民党已经死灭，他的旗帜最多不过是“蒋介石第三”的旗帜。必须是工农贫民兵士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必须是群众选举的、剥夺反革命的豪绅资产阶级选举权的政权。

（二）土地问题——今后应当切切实实明了“农民群众下层自动没收土地”之意义。土地问题决非某一政权（自蒋介石第一到蒋介石第三的一切政权）所能出一布告法令，

限制几亩以上不准没收的，农民暴动即是实现“耕者有其田”、“分配田地”；农民自动的干，我党应当竭全力以赞助，并且要领导他们去干。“耕者有其田”及“分配土地”，普遍群众斗争，客观上是土地国有的实行，因为只有群众如此行动起来才能创造出工农民众的国家，只有工农民众的国家才能实行土地国有——宣布“耕者有其田”是全国人民的，宣布一切人不得买卖土地。

(三) 劳动问题——我党在武装暴动创立工农贫民政权的总政策之下，自然要有最彻底的：一、“八小时工作制……等”的工人问题政纲；二、工农政权要没收中外大企业及银行，要实行国有银行、大工业及一切交通事业；对小企业手工工场等厉行彻底的劳动法，对于不遵劳动法的店东、厂主严厉的处置，一直到没收。

(四) 策略问题——对于买办豪绅资产阶级，必须极严厉的实行歼灭政策，不能稍有犹豫动摇的态度，并须勇敢的摧毁他们一切权力机关，武装的，金融的，交通的，一切种种反革命工具。对于小资产阶级不可以存着怕他们反动而迁就他们的心理；我们猛烈的摧毁现在有的豪绅资产阶级的秩序，小资产阶级是要动摇甚至反动的。但是工农政权的确立，实际上也是解放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他们客观上只有赞助工农是他们的出路。

(五) 军事问题——辛亥革命直到现在，都只有“将变”——冯玉祥、郭松龄、唐生智、周凤歧等等的倒戈，“民军”“游击队”等等土匪首领的受编。现时我党的军事行

动，必须是“兵变”——兵士群众、土匪群众在我们政治口号之下转移他们的武器来反抗长官，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权。总之，既名^为“民众武装暴动”，那就必须是民众的。工农群众奋起抢夺敌人的武装，兵士、土匪群众举起武器来干，——打倒一切“上等人”的权力。如此之军事行动，才是民众的武装暴动，这种暴动里才能产生真正的工农革命军。这种主力的创造和发动之中，才能偶尔利用“杂色军队”和“土匪首领”“中立”；否则便是国民党（“上等人”的党）老方法——纯粹利用军官及土匪首领，结果，是无穷的造成豪绅资产阶级的武装势力而已，他们始终是要杀工农的。

（六）党的问题——在这总的武装暴动工农革命政策之下，党的作用高于一切。必须有党的指导，政策上，如这次委任杂色军队，及与张发奎接洽等，都是前敌各个人的任意行动。政治指导集中于党是非常之重要。再则，工农革命军中，必须有党代表的制度，三则，各地党部必须深深建筑于群众的基础上，在日常斗争中一步不放松的宣传夺取政权的必要，四则，各地党部必须详密的探乘敌人武力上，财政上……的情形，总之，党要在政治上、技术上真真实实的做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好准备。

叶贺失败之中，如上述之许多错误，显然是机会主义的遗毒，我党必须深切的认明：下极大的决心，重造我们的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彻底肃清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造成真正群众的、革命的、阶级的、布尔什维克的党，然后才能担负起现时所负的重大使命。

“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

(一九二七年十月)

李立三

(一) 南昌暴动

七月十九日我和中夏同志奉中央命令到九江，谭平山同志亦到。当时在军事上四军、十一军已向南昌移动，驻扎于马回岭、涂家埠一带，二十军已渐次集中九江。朱培德之三军移驻彭树，九军移驻临川。程潜之六军经江西之口口萍乡分道向南昌集中，有包围我军之势。在政治上武汉政府已完全反动，唐生智正在积极屠杀我党，压迫工农运动。汪精卫已完全投降于唐。张发奎态度虽仍表示反唐，却已深受汪之影响，高唱拥汪，并表示对我们不满，有“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之表示，军事上已到了极严重之时期，而张尚徘徊于武汉，则张之不可靠，更可证明。同时，湘鄂农民运动虽受严酷之摧残，仍继续不断的在各处武装斗争，城市之工人亦在继续斗争。当时党的政策，正

准备在秋收时期号召广大农民暴动，在武汉亦正准备作反政府的大示威。所以就当时形势，“南昌暴动”已经是我党必然应取的政策。不过我们动身时，中央并未给我们准备此项工作之任务。因此我们到后，第一次会议觉到张发奎态度之犹豫与右倾，那么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甚至为三、六、九军所包围而完全消灭。纵然回粤成功，我们亦必在张、汪协谋之中而牺牲，将与我们回粤去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目的完全相反。所以我们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逼迫张、朱与我们一致（当然当时这种观念还没有脱离机会主义）。因此，决定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在这次会议中没有不同的意见，遂将这项意见报告中央。我与中夏即赴庐山和秋白商议，秋白亦完全赞同这项意见。当时闻中央有召集紧急会议之讯，请秋白代表在得负责同志之意见，并请中央即速可决。

越二日，形势益紧张，张发奎尚未到得，态度更右倾，并闻将有庐山会议，来实行解决在第二方面军中之共产党，同时平山已将在南昌举行暴动之计划，探贺龙之意见，贺表示甚为热烈。因此更有进一步之决定，军队于二十八日以前集中南昌，二十八晚举行暴动。并急电中央征可否？当时我尚在庐山，得中、平、代英等电召即返

得，参加会议，此次会议对暴动计划完全一致。在政治上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没收大地主土地（次项决定在此次会议上有很大的争论，至第二日，恩来同志始完全决定），实行劳动保护法为暴动之目的。在这项纲领之下发表宣言（用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名义）。

第二日恩来自汉赶到，报告中央意见，认为形势既已如是，对在得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遂积极进行军事之准备，并由中夏同志将详细计划回汉报告中央。我们遂于二十七日齐赴南昌，正式照中央命令成立前敌委员会。当时因军事的准备来不及，遂改定于三十日晚举行暴动。二十九日早午，连接特立^①同志自得发之两密电，谓“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他到再决定。”当时前委决定：暴动决不能停止，仍继续进行一切。三十日早特立同志到南昌，当开前委会，特立报告中央意见宜慎重，国际电报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将在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所以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当时，恩、代、立、湃、平都一致反对此项意见，谓暴动断不能迁移，更不可停止，张已受汪之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在客观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争论数小

① “特立”即张特立，就是张国焘。——编者注。

时，因特立系代表中央意见，不能以多数决定，故未解决。到三十一日晨，再开会议，又辩论数小时之多。特立最后表示服从多数，始决定于是晚二时举行暴动。是晚因二十军某营长泄漏秘密，增加行动时许多困难，至翌晨六时始将三、六、九军在南昌之部队完全缴械。

(二)军事计划与回粤之经过

暴动之第二日即成立革命委员会，在革命委员会之下组织参谋团主持军事计划。关于军事方面自南昌至汕，有多次之讨论，其经过大略如下（我没有参加参谋团和党内的军委，故仅知大略）：

一、关于回粤路线的讨论

关于回粤路线的问题，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由樟树、赣州，取道韶关，沿粤汉路直取广州。另一意见主张由赣东经寻邬直取东江，以为是此路线可以避免敌人之攻击，并且可以很快的与东江农民暴动联络。当时俄顾问、恩来及参谋团同志都主张第二种意见，只有很少军事工作同志及一部分非军事工作同志主张第一种意见，所以结果遂决定取道赣东取东江。

二、由南昌至瑞金

五号从南昌出发，经三日赶到临川，天气极热，沿途

多系山路，每日行六十里，实际多至百里。兵士负担极重，每人背二百五十发至三百发子弹，机关枪大炮，都系自扛（因无伕子）。沿途全无农民运动，加以反动派的宣传（杨如轩事先通电各县，说我们是北军，实行公妻共产），所以沿途农民闻风而逃，食物与饮料全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粥，渴则饮田沟污水，以故兵士病死极多，沿途倒毙者络绎不绝。同时军队中多无军医处、卫生处等的组织，无法救治。加以宣传工作极坏，兵士全不明此次暴动的意义，因此，军心大为动摇，逃走的极多。仅行军三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完全丢尽，大炮亦丢了十几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士将近四千（二十军最坏，军队纪律亦极坏，放枪拉伕等事随时都有）。

第十师亦于到达进贤时，将我们在该师之主力范进同志团（三十团）解决，开到浙江去找南京政府收编去了。原来参谋团决定第十师走极左翼，与中路相距近百里，因此无法监视。

在临川驻了三天，对外及军队的宣传工作方才开始（前委才决定许多宣传工作的计划），在军队的党的组织，和军队本身都有相当的整理，所以，从临川到瑞金二十日中情形比较好，行军亦较缓（每日平均约五十里），兵士可稍休息，天气亦较凉快。但是沿途农民因受 A B 团的宣传，对我们更加仇视，数日不见一人。譬如宜黄县城原有近二万人口，等我们到时，全城仅留有四十八个六十岁左

右的男女(在我们未到前曾经土匪骚扰)，因病落伍兵士常被农民惨杀。过石城后才比较好些。

到临川时因为二十军、十一军的参谋都逃跑了，原定军事计划，有完全泄漏的危险。所以决定到瑞金后，改道经汀、杭取东江。

将到瑞金时得探报，已有敌人，遂决定攻击瑞金的计划，在离瑞金三十里之壬田市与敌人接触，仅三小时即击破敌人三团，我军亦伤亡六百余，遂取得瑞金。

在瑞金得到敌人许多文件，方知敌人攻击我之计划，并有优势之敌人在会昌，钱大钧、黄绍竑两部约计十八个团。遂改变计划先攻破会昌之敌，然后折回瑞金，再转道汀、杭取潮汕，因恐会昌之敌不破，敌人可以随时袭击我之后方。同时，过会昌经寻邬取东江山路很多，给养极为困难(据以后调查并不如是)，故不得不先攻会昌再折闽南而取东江。

会昌之战极激烈，将钱大钧之主力完全摧毁(钱军力约一万人，败后仅收集二千余人)，我军亦伤亡八百人，黄绍竑的损失极少。

因战事及军队迂回往返的关系，在瑞金停留约一星期之久(前委在这星期中开过几次会议，一切政策都有很大的改变)，始到汀州。

三、由汀州至汕头

在汀州时关于取东江的计划有详细的讨论。当时有两

方面的意见：一、主张以主力军由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以小部分军力（至多两团）趋潮汕，盖料敌人恐慌已极，潮汕空虚，可以不战而败。并且经潮汕再取兴宁、五华攻惠州，过于迂缓，敌人有集中兵力攻击我之可能。二、主张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于三河监视梅县之敌，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盖恐敌人死守，潮汕不得，便难取得外面的接济。恩来、希夷均主前说，俄顾问与贺龙、伯承等均主后说。同时一般军官长期行军之后，均欲得地休息，多赞后说，遂照后说意见决定。自上杭至潮汕，沿途毫无战事，到汕头时敌人已退二日。

四、汤坑之战与潮汕失守

原定到潮汕的第二日即向揭阳出发，但因筹取开拔费的关系，在潮汕停留三日始出发。当时二十五师留在三河，二十军第三师留守潮汕，因此，出发前方者仅二十四师及二十军之第一第二两师，共计不够六千战斗兵。

当时敌人已到达汤坑，总计兵力五师以上约一万五千人，三倍于我。在分水、汤坑之间激战三昼夜，我军伤亡过多（二十四师之下级干部伤亡殆尽，二十军亦死团长二人），无兵补充，遂不得不下令退却。同时敌人以一部兵力攻潮州，以海军攻汕头，汕头之敌虽被击退，潮州竟失守。于是不得不并汕头亦放弃。

九月三十日晚二时，遂决定放弃潮汕退海陆丰。革命

委员会到普宁之流沙两日始与军队会合，但是在流沙之西十里便有敌人截击，遂溃败不可收拾。当时二十军之两师已过前方，仅二十四师在后面，退至甲子港时收集仅九百余人，现尚驻在陆丰一带。二十军将到陆丰时，遂被陈景棠军缴械。留在三河坝之二十五师，曾大败敌人，亦已伤亡过甚，向和平方面退却。现在尚余二千余人，枪枝约千余支。

(三) 政权的组织

一、革命委员会的组织

在暴动之前，决定在原则上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权，实际上便是组织一以共产党占多数的与国民党左派的联合政权。名义上使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继承国民党正统”来号召，反对宁、汉政府。暴动之翌日即由中国国民党各省党部及特别市、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的名义，产生革命委员会。

关于革命委员会的人选，经过一次的讨论，主要的争点，便是关于张发奎的问题，在暴动之初，对张发奎的态度已有不同的意见，就是暴动的决定不必问张的态度，和必须拉拢张始能暴动。最后的决定虽然是不管张的态度如何，由我们直接来干。但是，在许多事实上，还是表现许多妥协敷衍张的政策。如暴动的第二日还由贺、叶分电告

张，并表示欢迎他来南昌，同是并用民众团体名义电张欢迎，在宣传上还不大尽“拥护张总指挥的口号”（这些都未经前委会正式的决定，在当时也没有同志正式提出反对的意见）。到讨论革命委员会人选时，特立、平山同志极力主张须加入张，恩来、立三主张张不应加入，但没有力争，代、湃无甚可否。所以，结果张竟为主席团之一，而黄琪翔、朱晖日亦列名革命委员会之中。

到瑞金后得到上海报纸，方知不但张发奎等已经旗帜鲜明反共，即所谓各省左派分子，亦完全投降于武汉政府，而武汉政府又实际上投降了蒋介石，同时各省军阀都用国民党名义封闭工会农会，残杀工农群众，因此，国民党名义已为工农群众所唾弃，所以联合国民党左派，继承国民党正统已从事事实上证明是当时机会主义的幻梦。因此，前委会议决定，对于政权的性质，须根本改变，应该建立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政权，不过在工农政权之下须有联合贫苦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实际上便是工农分子占多数和共产党占多数的政府。同时，决定乡村政权应完全归于农民，并须以贫民为中心；城市政权，工人须占绝对的多数；县政权，工农分子应占绝对的多数。

到汀州后，又决定名义上仍沿用国民政府，方可以应付外交，免帝国主义过分的干涉（这是表现当时对于帝国主义过分的恐惧）。同时，并决定以平山同志为委员长，而把陈友仁等都加入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之中。虽然加入了许多工农分子，如顺章、荷波、兆征……同志等，然实际上

几成对原定的政策的敷衍办法，因为，除兆征外都仅是空衔的政府委员。

(四) 土地革命的政纲

在九江会议时，对土地革命的政纲已有不同的意见，立三、代英主张须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为暴动的目的。因为，南昌暴动的主要意义，就是要继续没收土地的斗争，实行土地革命。中夏、平山反对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谓恐因此惹起反动势力更加联合的攻击和军队内部分化。争论激烈，当日会议无从决定（两方人数一样），只决定报告中央征可否？翌日恩来到得，始传中央的意见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方得最后的决定。

关于土地政纲的第二次讨论，是在南昌暴动以后，农工委员会提出农民解放条例中，有“没收二百亩以上大地主土地”一条，当时会议上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或以为二百亩的限制还是太低，主张没收三百亩到五百亩以上的土地。或主张实行武汉议决后搁置之土地政纲，“肥田五十亩，瘠田一百亩”。甚至还有主张全不提出者。最后代英同志说：“我们这次‘八一’革命就是要实现土地革命，所以我们决定了土地政纲，在沿途就要开始实行。只要真能实行，就是没收两百亩以上的大地主都是好的”。因此遂照原案通过了。

此项政纲决定后许多同志都很怀疑，沿途找到在军队

中的广东农民讨论，有一个农民很痛快的答复说：“如果是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大地主，便是耕者无其田”，因为在广东两百亩以上的大地主便是很少，除掉许多公田以外。这一句话把许多同志的脑筋都惊醒了，因此，到瑞金后，前委会议遂决定改“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大地主的土地”为“没收土地”不加亩数的限制。废弃原有农民解放条例，另提出一修正条例。

第三次的讨论系在上杭讨论国民政府的政纲时，当时多数同志的意见都是主张全部没收，因为觉得农民暴动起来了，不但二百亩以上地主的土地会实行没收，就是二十亩以内的自耕农都会没收，甚至平均佃权，湖南许多地方的农民对土地的处置便是前例，我们政府当然不能因为他超过了土地政纲限制和侵犯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便压抑他们。所以应根本提出“没收土地”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至于拉拢小地主的方法，可用其他的政策，如小地主的土地没收后由国家发给一种有息不还本的债券等。特立的意见，对小地主仍当有相当的保障，所以主张改为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因为多数的意见都是主张全部没收，所以当时的决定还是“没收土地，耕者有其田”。到第二日，广东省委来了一份详细的政纲，对土地问题，是“没收三十亩至五十亩以上的土地”，对于依靠田租为生活者不没收，并已经在各地宣传。因此，特立再召集会议，遂照特立的意见“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的土地”通过了。

(五) 劳动保护政策

在暴动之前后，很少注意到工人问题，直到瑞金以后，前委会才讨论一次关于劳动保护的政纲，结果，由农工委提出一劳动保护暂行条例，仅十九条：内面规定产业工人八小时工作制，手工业工人每日十小时工作，因公伤亡之赔偿，和疾病死亡的抚恤，失业保险及童工女工的保护，产前产后的八星期休息等，条文很简略，也未经过严重的讨论便通过了。

(六) 财政政策

自南昌暴动后，革命委员会成立日曾讨论到财政政策的问题。当时意见在原则上几乎一致，就是要根本改变以前军阀的财政政策。将财政的负担从贫苦的工农身上转移到富有阶级。并决定即时废除厘金，及其他苛捐杂税（这一点当时已有反对的意见）。到了临川以后，军饷一天天困难起来（因纸币不能用），急须设法筹办现金，因此想起关于财政政策的大的讨论。总括起来有两种意见：一，主张沿用旧的政策，就是每到一城，即行提款、派款、借款等，实际上就是利用一般劣绅土豪来筹款。这种政策的结果，自然是剥削到一般贫苦的工农小商人身上，大商劣绅反可从中渔利；二，主张应完全抛弃旧的方法，目前的政策，

应该以征发（如征发地主的粮食）、没收（没收劣绅反动派等的财产）和对土豪劣绅的罚款等。平山、伯渠等都主张前一个意见，立三、特立、代英、恩来等都主张后一个意见。这两个意见当然是很明显的，如果我们采用前一个财政政策，不单如军阀筹饷无异，并且要动摇我们的根本政策（如建立工农政权，镇压土豪劣绅等）。所以在会议上虽然有争论，因前一说的理由不充足，自然是决定采用新的财政政策。但是到了实行的时候，却又发生问题了。因为在赣东一带全无农民运动，谁是大地主和土豪劣绅很难于调查，而旧的方法确可以筹到少数的现金。因此从临川至瑞金筹款方法极为混乱。于是平山同志得出一个原则：“只要有钱，不问政策。”到汀州时，因为商会承认筹款，所以对于惩办土豪劣绅都主张放弃了（平山曾两次写信给我，要我缓提土劣）。但是，结果上了一个很大的当，原来汀州商会承认三天内缴款六万元，遂让商会在城乡大派款，连十亩以内的自耕农及很小的杂货店都派他们十元八元不等，倒是十万元以上家产的仅出三五百元。这样搜索的结果，三日仅得二万余元，并且闹得满城风雨。因此，革命委员会只讨论一次，立三、特立等极力批评这种政策的不当，遂又决定完全取消旧的方法，采用新的政策。遂在汀州大捉豪绅，实行没收与罚款，并发还许多贫苦工农的已出的派款，仅二日，即得四万余元。于是，决定到广东后全用新的政策，并组织一战时经济委员会来管理一切。但是，到了潮汕竟又完全放弃了。当时平山同志提出两个理

由：第一，大规模的征发没收恐惹起帝国主义的借口干涉；第二，潮汕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大规模的征发没收的结果，将是商业全停，秩序混乱，使反动派得以扩大宣传。特立同志为第一种理由所摇动，恩来为第二种理由所动摇于是财政政策一仍旧贯，战时经济委员会便从此夭殇了。

（七）镇压反动派

在革命委员会之下设立政治保卫处，专为镇压反动的机关，并决定对于土豪劣绅等反动派采用严厉镇压的政策。开始在赣东一带因无农民运动，几乎无法进行。仅在驿前、广昌、平山市、瑞金、会昌等处杀了三十几个土豪劣绅和几个 A B 团的分子，到汀州杀了四个劣绅。在当时准备到广东后大规模的屠杀反动派，但是结果仅在潮州杀了三人、大埔四人、汕头十二人。原定的政策竟未能实现。有几个主要的原因：第一，重要的反动分子已闻风先逃无法搜捕；第二，潮汕以东农民运动极弱，主持同志的观念极为糊涂。如在大埔要当地同志开一反动派的名单，以便按名拘捕，他们却在名单上注记：“某人应处以徒刑五月，三月，或无期徒刑等”，其他如三河坝等地完全没有农协的组织，更无法拘捕；第三，我们主观上放弃镇压反动派的政策，如在汀州、潮汕时，平山几次和我说要缓办反动派，徐光英同志，就任汕头公安局时，反动派还没有开始惩办，反先捉乘乱抢劫的人三名枪毙了。有一个海员

工友看见了，马上说“这是蒋介石第三的军队。”到潮汕失守时，牢内还关有几十个反动派（多半是工会送来的），竟无法杀他（晚上不能放枪，又没有刀子）。反动军队到，自然马上出来，更厉害的反动了（汕头工会也极弱，有这个工会捉来，那个工会强迫要保，后来要总工会审查一张名单来，弄了五天还无结果）。

（八）宣传工作

在革委之下，设立一宣传委员会，专管宣传工作，同时又设立了总政治部，管军队内部的宣传工作。然而此次的宣传工作，却做得坏，宣传的口号，政策的错误，这是由于总的政策的错误，当然不能归咎于宣传工作，但是连“八一”革命的意义，不但是没有深入群众，就是两军的士兵亦不明白，二十军的兵士沿途骚扰农民，拉伕拿物，甚至奸淫的事都发生过。就是十一军的兵士直到失败后还说：“四军、十一军本是合一的，就是叶挺弄坏的。”这都是因为宣传工作没有深入兵士的原故。

（九）赣粤工农运动和暴动

江西党的组织极弱，工农运动当然不好，赣东除临川、宁都有特支组织外，其余所经各地毫无组织。完全没有农民运动。反动的 A B 团的势力却很大，所以在赣东一

带不单是不能得到农民的帮助，并且受了很多的阻障。

沿途向兵士宣传广东农民运动极好，只要到了广东，各县的农民，一定可以马上暴动起来，至于仗子粮食等当然毫无困难。不但是一般兵士都很相信，所有的同志都是这样想。但是一进广东界，却使人大失所望，农民对军队的情形还不如福建，到了大埔，已经有工农讨逆军的组织，并且准备暴动已经两三月之久。但是，只有很弱的、极幼稚的军事技术的布置，全未注意煽起群众的工作，更未注意群众的组织。以至我们军队到了，连拘捕反动派的工作都不敢做。军队开拔时要他们召集一百农民组织农民军，保卫县政权，结果仅得五十余人。

三河坝在军事上极为重要，但是当地全无农会的组织。松口为工农讨逆军第八团团部所在地，仅有七十几个农军，农民群众亦未起来。我们交了一百五十枝枪给他，结果找不着农民来拿。

我们想象中的汕头，一定工人运动很发展，工人的斗争一定很厉害，因为在省港罢工时经过很长期的斗争。但是到了汕头，表现得非常之弱。我们预备将以前的警察完全取消，因为完全是压迫阶级的工具，组织五百工人义勇队来代替他，经过三天的号召仅得七十余人，并且都不甚愿意，因为饷项睡食等等都不如意。可见群众的阶级觉悟非常之弱。

在汕头也经过数月的暴动准备，但是也因为只是注意军事技术的准备，不知道对群众政治的煽动，所以结果群

众不能起来。

潮汕以东一带农民运动较好，农民群众经过长期的斗争，暴动军事的准备亦较完善（仍是缺乏对群众政治的煽动和组织），群众亦自动起来参加，所以在我们军队未到以前，农军已将海陆丰两城占领了。我们到时，朝阳、揭阳的农军也占了县城，普宁四乡的农民都起来暴动，将县城围住了，反动派死守县城，有枪八百余枝，机关枪大炮都有。农民围攻不下，派人要军队援助，当时派了十一军一营人去助攻，只数小时便攻破。本可将普宁所有土豪，聚而诛尽，但是这一营长（同志）在攻破城时，不让农军进城（因恐农军杀戮太多），同时并宣布：“革命军是不扰民的军队，决不会随便屠杀的。”到军队撤退时，农军也不敢杀了。因负责同志这样想：“军队是我们自己的军队，他不于破城时大杀反动派，或者是团体预定的政策。”

只有朝阳方同志带的农军于破城之后曾大杀反动派，农民异常欢迎他。浮阳农民与地主激战数日，后经军队的帮助将民团缴械后，农民将地主大烧杀了一次。但这些地方的反动派尚未完全肃清，而军事上已完全失败了。于是各地的农军都只好仍旧上山去。

（十）党的组织

“八一”革命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完全在党的指导之下，实际上不过是许多共产党分子的个人指导，最后几乎变成

平山同志的个人指导。

中央的“八七”紧急会议，虽然是党的政策与组织脱离机会主义进入布尔什维克化的一大关键，但是对于“八一”革命以后的政策未能充分注意。如国民党问题、政权问题、财政与经济政策、外交政策，均未有明确的决定。至于指导的技术上，更是疏忽。我们在前敌的同志，直到了汕头后，才知道有“八七”紧急会议的这回事。行军两月，简直成了野人，不单是不知道党的情形，并且连全国大的政治状况都不知道。蒋介石下野，我们到汀州看见上海的《申报》才知道。

前委的组织原照中央命令，没有平山同志，但是当时平山在政治上负了很大的责任，中央并未将他撤换，所以前委商量的结果，只好要平山参加前委会议。到南昌时前委组织比较完善，后来革委成立，都加入到革委去了，并且都是担负很繁重的工作，各项技术工作人员也取消了，于是前委变成了革命委员会的党团。同时负责的几个人，都是前后左右分途而走，很难集合一块开会。因此，除掉几个重大根本政策以外，许多重要的问题都由负责同志随意办理，甚至违反已定的政策，也不能纠正或制裁。可以说前委本身组织非常之弱，在政治上，几乎完全失掉了指导。譬如在汕头再与张发奎联络，和滥委陈炯明部为师旅长等事，有几个参加前委的同志当时全不知道，直到香港才听见说。

在革委内工作的约二百六十余人，内有一百八十余同

志，但是到汀州才组织起来，开过两次大会和几次支部会。至于他们的工作，前委全未能加以管理和指导。

军部方面的组织比较好，各种会议也比较的多，不过与前委的关系很坏，因为军部在组织上是独立的，就是一切政治的指导都须完全经过军部，同时军委亦很弱，所以党的政治的方针很难深入到军队中的同志去。这是党的组织上一个很大的弱点。

经过各地党部的组织，都异常幼稚，并且充分表现机会主义。在赣东一带不必说简直全无党的组织，就是在粤东一带所有各地的党部，不过是一些共产分子的集团，全不是群众的斗争的组织。有些地方曾极力做暴动的准备，但只注意军事技术，全不深入到群众中去。这种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实在是党的根本的危险。

(十一) 结 论

“八一”革命在客观上是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工农阶级直接夺取政权的开始，同时就是国民革命最后一个阶段，土地革命的客观。但是因为党的政策深中机会主义之毒，不但是得到一个最后的失败，并且把本来客观上赋与的意义都完全失掉，而成为一种简单的军事投机。第一，国民党在武汉反动，屠杀工农以后，已成为群众所唾弃已臭的死尸，所以“八一”革命应该是工农政权的开始，但是还死恋着已臭的死尸，好象要靠总理在天之灵来保佑

一样。革命委员会之中几乎全数是共产党，但是每次开会时还是要宣读总理遗嘱，想起来真好笑！到瑞金以后已经在原则上决定要建立工农政权了，便是还舍不得一块国民政府的招牌，直到汕头失守，才决定取消国民党的名义和“白色恐怖”的旗子，这就是机会主义在这里作祟。第二，明知道“八一”革命的意义，主要的是土地革命，但是却提出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大地主，这种“耕者无其田”的土地政纲，就是党在第五次会以后所谓联合小资产阶级的结果。第三，可从对汪精卫的幻想中得着很大的教训，但是却又恋恋于张发奎。到了潮汕张完全反动了，看见他到广州挂了一块反南京的假招牌，却又对他悬着很大的幻想。这完全是小资产阶级依附强力的心理。第四，不敢屠杀土豪劣绅，反对征发没收的政策，却维持旧的秩序来装璜国民政府的招牌，充分的表现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汕头工人说“这是蒋介石第三的军队”，真是一点不错！第五，暴动是群众创造的艺术，没有群众便无所谓暴动，但是我们在各地暴动，只有军事的准备，完全没有发动群众，并且到准备暴动时，注全力于军事组织，把原来的群众组织都放弃了。所谓工农军的暴动，不过是变相的军事投机。第六，不去极力发展群众，却认与陈炯明的余孽接洽及联络土匪等是重要工作。第七，军事行动不图与敌人作决死争，却极力避免敌人的攻击，这都是军事上的机会主义。

这次“八一”革命的政治上的错误，可以说党的历史上的机会主义的结晶，伟大的“八一”革命，完全被机会主义

断送了。当然军事上虽然失败了，革命还在继续高涨中，革命的主力工农群众还在继续奋斗中。不过我们不深深领会这些教训，我们还会继续做断送革命的罪人。同志们不要忘记了“八一”革命中所得的宝贵的教训！

中共中央复张国焘的信

(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国焘同志这信中所提各点，本次扩大会议的议决案都可以答复。至于国焘同志的错误之主要点，政治纪律议决案已经说得很明白，事实的经过是：——国际上电报说：“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这无异乎是说：“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中央常委曾讨论这一问题，大家认为即在汉口亦可见着必有胜利机会，故派国焘同志去前敌，以坚决前敌之发动，这是在汉口的事实。当时出席或参加常委的同志（维汉、太雷、秋白……）都证明的。国焘到前敌去，却因为自己对于张发奎有妥协动摇倾向，而表示怀疑举行暴动的言动，这是在前敌的同志（恩来、立三……）都证明的。事实是如此，国焘同志信的主要意思，可以用这种事实答复。

中央常委

附：

张国焘致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扩大会议的信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八日)

中央临时政治局诸同志并转扩大会议：

本月六日接读通讯第七期，内载张太雷同志十月十五日在南方局粤省委联席会议席上报告。他的报告第一段中说：“后来中央又派国焘同志去，意思是要他去鼓动同志更坚决执行中央政策；不料国焘假传圣旨，说国际不主张干，他亦极力反对于——国焘，这不仅损失个人的信仰，而且损失中央的威信，——故此次国焘的行动，实应受处分。”此段报告与事实不符，因此有根据事实慎重申明之必要。

(一)当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之间，中央常委得悉在浔同志主张在南浔一带发动暴动的时候，中央常委及国际代表都表示赞成。为什么要暴动，当时虽没有详细讨论，可是已具体的准备一切暴动的需要。准备事件如下：一、经费的筹措；二、许多同志及俄顾问陆续派往九江；三、实际赞助国民党左派在九江的会议和结合。后来决定派恩来同志去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其任务是去指导前敌方面工

作，准备于必要时，在南浔起义，由赣东入粤，与广东东江农民结合，这是第一段事实。

(二)七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时，中央常委开会，出席者为秋白、罗迈、太雷、国际代表、少年国际代表、加伦、范克诸同志，翻译若克、家展两同志及国焘，当由加伦报告。加伦说：今日会到张发奎，和他讨论军事，他已赞成二十军集中进攻，十一军集中南昌，第四军集中南浔路一带，不再东进，第一步按兵不动，第二步渐次往南昌移动回粤。加同志说：据他的意思，张发奎如能赞成回粤，又不强迫叶挺等退出共产党，在此两条件之下（其他条件如汪精卫、李济深等态度可暂时不管），可与张发奎共同回粤。但回粤后，我们与张之间的分化是不可免的（我记得加伦将这句话重说了两遍）；接着又说：因我推测，假如我们在南昌与张分化，做得好可得八千兵，不好只有五千兵，军事上在江西即要遇着朱培德、钱大钧的部队及张发奎剩余部队种种阻碍，恐难于到达东江。若与张共同回粤有二利：一、共有三万兵，易于打破朱培德、钱大钧种种阻碍；二、我们既然推迟我们与张之间的分化，将来可更多分化张一部势力。若张不能同意上述二条件，那我们就不得已要在南昌干起来。加伦报告后，大家并未发言，当时情形大家是默许他的意见。接着国际代表报告说：现在经费一时无着，又国际电：不许俄顾问以任何形式参加这次暴动，现在较之我们以前所讨论者，又有这两件不同的新事实。接着说：国际来电内容：如暴动毫无胜利希望，则不如不进

行暴动，张发奎军中同志尽行退出，派往农民中工作，现在此二件新事实及国际来电，既不能寄信告知前方同志，须派一得力同志当面将这些情形告知他们，说罢目视国焘，并说可否派国焘去。当时国焘即说：既然责任是送信就不一定派国焘去。当时国焘之所以这样说，因中央扩大会议开会在即，如能不离开中央，还是不离开好。并说王一飞同志可以负担这使命去。接着国际代表说：只今晚便须起程，如何能够找到一飞同志呢？接着秋白、罗迈就说：还是你去一趟罢，责任不单是送信，是要去看看情形，参预决定呢。因此就派国焘去，起程异常匆促，抵船时已八时，船将开行矣，这是国焘因为去得及任务的真相。当时国焘曾细想：何以加伦本来实际已准备发动的计划，今日为何发表这段意见，又国际代表是最主张在南昌发动者，何以又报告此国际来电，何以有此两件新困难，何以又主张国焘去。这是第二段事实。

(三)当时我对于南昌发动的意见是认定我们与张发奎间的分化是不可免的，但若在南昌即行分化，实觉太无把握。当时因党中遭受许多打击，发生许多困难，加之新国际代表来带着国际的许多责难，心中十分烦恼，故亦未将此意见提出讨论。但曾经向周恩来同志说过两次，因恩来即须赴得，所以我向他说。据我看来，我们仓卒与张发奎军队分化（当时加伦谓两重分化同时进行，其意指一面与朱培德等分化，同时又在张发奎军中内部分化），恐怕很难有把握。恩来当时未置可否。我接着又说：这新国际代表

愿意如此主张，你看其他俄同志意见如何？恩来说：新国际代表来，范克等都不敢表示意见，看加伦意似不主张在南昌发动。我接着说：所以呀！恩来说：到那里再看情形吧。我记得我曾经将这意见向其他中央常委的同志说过，但现在记不清是向那个说的了。这是第三段事实。

(四)七月十三日我党发表宣言，尾一段大致说：共产党不退出国民党，不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又说孙中山之光荣旗帜永久在革命民众方面，决非反动的妥协的伪国民党所能盗窃的。新国际代表来，我们曾问他对此宣言意见。他说：大致很好，只尾段里说：还希望国民党指导机关及国民政府能实行这种革命政策，未免不好。我记得当时曾问国际代表：我们现在对国民党态度究竟如何？他说：国民党的旗帜还是要用的。当时中央实际赞助所谓国民党左派联盟在浔结合的运动。这是第四段事实。

(五)国际指摘中央对于土地革命不坚决主张，是从六月间当时中央政治局开会，鲁易主张向国民党提出没收土地的口号，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以为当时向国民党提出没收土地的口号，等于对牛弹琴，因此受国际的责备。彼时我党中央对于土地革命，实在是主张不坚决，是机会主义的态度。但是问题在是否提出没收土地的口号。后来国际来电，主张没收土地，说要农民自动起来没收大中地主土地，如情不许可，即中等地主土地也暂不没收亦可以。新国际代表来时，中央常委已拟好一个农民运动议决案，主张没收大地主土地，秋季进行抗租减租的运动，他看了表

示赞成，只说农民运动应以没收土地为重心，此议决案只是太把减租看重要了。他是对于小地主始终说准其享有土地所有权。七月十八日我党发表的目前行动政纲，还是说没收大地主土地，至于说没收一切土地的决议，那是八七会议以后的事，为前敌同志所不知道者。这是第五段事实。

(六)当武汉唐生智汪精卫政府日见反动时，彼时我党与张发奎关系尚好，事实上我们曾将农民的枪枝送给他，并答应他给他种种的帮助。这是第六段事实。

(七)我奉命于七月二十七日晨抵得，即与贺昌、语罕、代英、乾五、夏曦诸同志会议，当将二十六日中央常委会议情形报告给他们听，结论即说：所以我来的任务是看看情形，与你们讨论这回在得发动的事件。贺、高、廖都说再无讨论之余地。代英更说：还有什么讨论，已经决定了。我说：为什么不可以讨论。他说：为什么要等你来。我说：这是中央派我来的意思，而且告述你们国际来电的消息。代英说：现在还管他中央不中央，国际不国际。当时在九江不但有这回一场的讨论，而且讨论了反汪的种种行动，后来都实行了。在九江候车二日始与代英起程赴南昌，到马回岭时，因车停四小时，晤周士弟等同志，我当即提出六七条暴动的实际办法，而且再三说发动时须按照此办法迅速而坚决的执行，当时代英、士弟等都一致赞成。三十晨到南昌后，当即与恩来、立三、彭湃、代英、平山、希夷、逸群等同志会议，当时我又将二十六

日会议情形报告一番，并问此地情形究竟如何？说完后，立三同志即简单说：什么都预备好了。哈哈！那里现在还讨论。希夷同志说：分化能推迟一点也好。平山同志即说：假使这次我们军中的同志还不能够干，那就以前一切军事工作都不能算是我们党的军事工作。接着恩来同志说：还是干。我说：我还不知道这里的情形，不过国际电报说，要有点成功的希望，才赞成干，加伦意看可否推迟点。恩来即气愤愤的说道：这种意思，与中央派我来的意思不符，我辞职不干了，今天特别委员会我也不去出席了。当时我即说：这有什么辞职不辞职，这又不是闹小孩子脾气。后来我又说：恩来等同志还是出席特别委员会，既大家的事情忙，把一个同志将这里的情形告我，等我看你们预备好的宣言。又有那位同志说：为什么你看宣言，究竟你是赞成干，还是要停止我们干。我即说：假使我知道了情形，应当干，为什么不赞成干。我并说：我过马回岭时，告诉士弟同志等如何干法，这是代英知道的。代英同志即说：他到是一样的告诉他们准备暴动。后来即讨论一些是否叫革命委员会或革命政府委员会以及出席特别委员会与贺龙等讨论应持之态度等问题。会散后立三告我贺龙等如何赞成干，及种种准备情形。三十日开第二次会议时，因得张不但偕汪精卫来，而且孙科亦来，在庐山会议及封闭九江国民新闻的消息，是否应立即干的问题已无讨论了。当时决定那修改宣言，平山说今日午后即要，我说要今晚才能弄好。平山说：然则就不必改了。我

说：大家斟酌一下也好。平山说：为什么宣言非你改不可，难道你想操纵这次暴动吗？我说：这是什么话，我当时即气愤愤说：我不管这宣言了，你们那位去改吧？恩来即说：回头还是我来改吧。这是第二次会议的争辩。又对张发奎问题，我当时始终主张保持表面上较好的态度，打电报给他，派人和他办点外交，以减少他的反动，因此或可以救出尚未达到南昌在张发奎部队中的许多同志。我记得有一次我问平山，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一面坚决进行，一面派人与张办外交。平山说：贺龙想取张发奎的地位而代之，我们正要利用这一点以拉拢贺，所以我们不好主张与张办外交。我记得有一次和代英说：我们若不与张办点外交，表示拉拢，七十七团及教导团中几百同志不会牺牲了吗？代英说：现在那里管得许多。又关于暴动日期问题，我主张推迟一二日，但须在张未到南昌之前。理由：因我们这里干起来，汉口中央及其余未到南昌在张部队中的同志尚不知道，恐防备不及，遭他们的毒手，须留一二日时间，等他赶到通知，好作准备。后来算是将暴动的日期由三十晚改至三十一日晚。至于推张发奎为主席团之一，并将黄祺翔、朱日晖亦参加革委，这也是我主张的，理由如上述。至于南昌起义后，张发奎必然更反动那是尽人皆知的，不过我主张多玩点黄袍加身的把戏罢了。当时我觉得少数同志一来事情忙，二来也决定干，都有点变态心理，讨厌多所讨论，故不知不觉有些意气之争。平山同志当时一心想另开一新局面，连中央及国际等名词都不愿

听。国焘当时常思及本人不能得同志信用，至令平山同志轻视中央之意，自我而损失中央威信，心中引为深懊。立三同志谓两次均争辩数小时，以及其他报告中简单叙述我的说话都与事实不尽符合。这是第七段事实。

(八)当提出没收二百亩以上土地时，我也是赞成者之一，当然是一大错误。后来在瑞金及上杭时，我提出必须修改，减至五十亩以上土地须没收。因代英提出对于解决农民条例一些怀疑之点说：“我们说得好听，分配土地给无业农民及兵士，但是土地已有人耕种，没收后，还是原佃耕种，那里有田分给无业农民及兵士？”当时大家研究结果，说没收土地一开始，那里能限制，是小地主自耕农的土地，农民都自动起来没收，而且会实行平均佃权；因此大家说限制五十亩，与不限制五十亩同，所以在上杭第一次会议主张只说没收土地，不加限制。后来细看粤省委政纲，有三十五至十亩不没收之主张，因此那晚我又邀集前委诸同志说粤省委既有此规定，想必有事实上的理由和中央决定的根据，我们还是限制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土地，或可对小地主示一个空惠，当时大家都赞成了。这是第八段事实。

(九)对于没收和征发的经济政策、工农化的军队、严惩反动派三主张，我为坚决赞成者之一，县市区村政府须实际工农政权，我为坚决提议者。认为这是建立工农政权进行土地革命的四个必要条件。至于政府仍叫国民政府，国民党依然存在，但须严格的从左清党，实际将国民党变

为工农化最大多数的组织，也是我主张的。我所以如此主张者，因我离开中央时，中央及国际代表仍然主张还是要用国民党旗帜。这是第九段事实。

现在事实的经过既然说明了。那么，太雷同志说：中央派我去鼓动同志坚决执行中央政策，不料国焘同志假传圣旨。假使我上面所叙述的是真正的事实，那就证明太雷同志的报告，不是记忆错误，或传闻失真，便有点故入人罪了。若说我假传圣旨，我是不心服的。若说我主张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土地为大错误，并说我对张发奎取较妥协的态度，对于暴动取较慎重的态度，或更批评我一些别的错误和过失，我都是心服的。

至于我主张仍然用国民政府名义和主张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土地等，那“八七”以前的中央的确有同样的原则的主张，只可惜我们在山中走了两个月，与世间隔离，遂不自觉其为机会主义了。

若说对于暴动取慎重的态度一层，近日得读国际第八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有一段说：“何时应该妥协，何时必须转守为攻，这要就具体条件决定。共产国际特别以为有些同志在蒋介石上海政变时，建议实行暴动的策略，十分谬误。这项策略的究竟，非以暴动进攻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先发制人之计，便须广布阵线，用武装力量和他们斗争。须知暴动的策略，乃是暴动既发，便要采取攻势。所以有了相当胜利的希望存在，才可以着手暴动。暴动是‘玩’不得的。‘无论如何都要暴动’的策略，不是列宁主义

的策略，假使上海工人发动了广大的武装行动，则必被蒋介石帝国主义联合武力扑灭，中国无产阶级的鲜血，在一个毫无胜利之希望的战争中，便会平白洒尽。”又忆起当上海工人纠察队在四月间与蒋对峙时，国际曾电令中央说：上海工人纠察队于必要时，可将枪枝藏起，保全实力，以图再举。现在至少在领导的同志中，是没有不主张或怀疑暴动的了。我个人对于八月一日南昌暴动，虽然觉得在这过程中，有许多错误，但是对于那次暴动取“玩”不得的态度，亦未可一概视之为机会主义。

国焘历年来都为中央机关之一员，凡中央机关种种指导上的错误都应负责；个人更有许多谬误的见解，和工作上的过失，每每忆到中国革命运动之屡遭失败，以及大批同志之遭惨杀，不觉汗流浃背。无时无刻不思奋起带罪图功，为党为无产阶级革命尽一份气力，为死难同志报一份仇。任何处分，都愿接受，而且慊其过迟。惟于事实不符合处，则不得不慎重申明之。尚祈刊之中央通讯。此致党礼！

张国焘

中共中央给朱德并转军中 全体同志的信（一）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自从三河坝与潮州的交通被敌人切断后，党的指导机关即与二十五师全体同志失了联络。潮州失守后，粤省委曾两次派人追赶你们，及你们退武平，转入江西信丰时，江西省委又派人前往接洽，最后知道你们已越大庾岭而入湖南，中央乃又命湖南省委派人与你们接洽。但一切都是徒劳，始终未得赶着你们。现时你们的踪迹，但从报纸上的记载和辗转传来的消息，似乎正驻扎在桂东和桂阳一带，惟仍未能证实，并且据江西省委报告，你们入湖南时，曾与范石生有一度之联络，此事如果属实，在广东暴动失败后，能否不为范石生所解决，很是疑问，因此，中央特派李鸣珂同志经江西入湘专与你们接头。除了中央一切重要的决议和关于军事运动的新政策以及最近各省工农武装暴动的情形和统治军阀崩溃的趋势已令鸣珂同志口头向你们详细报告外，中央更有以下的话要说：

一、叶贺军队在潮汕的失败，一方面固由于军事战术

布置的不当（如入粤时不以主力攻梅属而直下潮汕，主力既集潮汕与东江敌人对峙，而又留二十五师在三河坝失其作用），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革命政策的执行有许多未脱旧时机会主义和军事投机的遗毒，以致入粤后，未能发动群众使军队化为工农的武装力量，而造成土地革命在潮梅深入的局面，无广大工农群众拥护的军队便是侥幸战胜黄绍竑、陈济棠，结果也还是军事孤立。不能使土地革命深入，甚至于客观上还会阻止工农运动，因为革命的军队，假使不能与工农打成一片，则仍是一个雇佣的武力，听少数领袖的指挥，不能表示群众的意识，即是说，不能以工农群众的意识影响此军事行动。固然这种错误，当时前敌的军队不能负什么责任，因为前敌的指挥机关，在“八一”革命前，既未能得到中央完全的指导，而本身的指导又犯了很多错误。而广东省委以及南方局*对于前敌的军队到潮汕时可号召的工农暴动，亦未能有充分的发动准备；不过军中所有同志，应深切的了解这种错误，务使这种错误，不再在我们同志所组织的任何军队中发生。

二、军事运动新政策的主要条件，是在党的新政策以工农的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由土地革命向社会革命的原则之上建立的，为了在反动军阀统治之下秘密的增长工农武装的力量，我们必须在工厂里农村中组织秘密的工农军，必须秘密的给工农群众和党员以武装的训练；必须组织群众的红色恐怖队，反抗白色恐怖的压迫；必须很技术的有计划的布置工农武装暴动前的必需条件；必须在工

农武装秘密的组织中，避免个人的英雄的无组织的指导，要充满政治的经济的阶级的斗争形势，更必须的是对于敌人——统治军阀——的武力，施以无姑息的破坏和分裂；在分裂和破坏的工作中，我们应一变从前巩固所谓国民革命军的态度，改成做侦探、做间谍、鼓动兵变、破坏军纪、勾引队伍逃走、引诱兵士卖枪、煽动兵士反抗官长、谋害官长以至全体瓦解的种种工作。自然这种工作是一个时候一个部队里所未能做到的，但我们作军事运动的人，有了这种计划，便不应丝毫放过。所以我们一方面反对国民党所属的一切军队，一方面仍应想种种方法秘密进去，做下级军官，做兵士，进行这种破坏和分裂的工作。假使我们所鼓动的兵变和勾引的兵士能够成为一种力量，我们当然立即组织在工农的武装组织之内，进行斗争和暴动的工作。但是这种力量，我们必须认清是工农暴动的副力，工农暴动的主力必须是工农群众自动起来的武装，没有工农群众广大的参加，专靠着一部分的变兵，或已拿着几杆枪的武装队伍，工农暴动不会发动起来的。便是这种无广大群众参加的武装力量，杀了很多的豪绅官吏工贼，烧了地主的房子，分了资本家财主的财产，烧了借主的借契，充其量不过是梁山泊上英雄侠义的行为，在群众眼内看来是替他们打抱不平的，这样不但不能使土地革命深入，并且一旦统治阶级的军队以全力攻来，到了不能抵抗的时候，好则上山，坏则崩坏，群众中是无法藏身的，自然更说不到扩大群众的参加，蔓延暴动的区域，以抵抗反动的势

力。所以我们分裂军队来助成工农暴动只能当做工农武装的副力看，切忌变成流寇式的队伍，来阻止暴动，现时你们队伍所处的境地和所负的使命，便应是这种工农暴动的副力。

三、关于工农暴动的范围，你们或已知道，你们队伍在暴动前后的责任，你们或已讨论过。不过我们要慎重指出的，你们用这种副力参加暴动或发动暴动时，必须避免军事投机的错误动作，大概军中同志，在这个新旧政策交替的时候，最容易把武力包办一切的观念，移植到工农暴动上面来，譬如农民暴动一开始，必须是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参加，然后才能使暴动中一切行动有意义而深印在农民心里。但军事同志则常易于初发动时便代替农民执行一切暴动动作，而忘了发动群众。或是专注意军事行动，企图固守一个阵地，或是扑攻一个城市，而忘了执行暴动中政治经济的社会的土地革命的各项条件。殊不知群众的暴动和军队的对垒有迥然不同的广狭意义，军队打仗是专门比赛技术，人的条件，是要在一定的技术范围内比赛谁的勇敢，而群众暴动是要在广大的热狂的反抗的情绪中，趁着统治阶级动摇的机会，武装了自己，推翻当地统治阶级的权位，夺取政权，同时并会扩大这种反抗及于周围的群众，以至于摇动敌人所雇佣的武装群众，技术条件在这里虽也成为暴动条件之一，但他却不能比暴动扩大群众摇动敌人所奴役的群众更占重要。认清了这一点，则我们以军队式的武力来参加暴动，便不会首末颠倒，否则我们不是

因为群众尚未起来便代替群众单纯发动暴动，即是不信仰群众的创造力量，借口于几件技术条件之未完备便阻止暴动，前者是军事投机，后者是机会主义，你们带领队伍在城市在乡村参加这一暴动任务时，必须防止这些容易陷入的错误，时时注意群众的发动、群众的扩大，以至敌人所奴役的群众的勾引或煽动。

四、你们的军队如已确实到达湖南的桂东、桂阳地方，你们工作的对象，便应从这几个县份计划起。据我们所知道的在桂东的北边茶陵、酃县以至江西莲花均有毛泽东同志所带领的农军驻扎，不知你们已和他联络否？各部分农军从前也有不发动群众专门代替群众从这县打到那一县执行英雄式的暴动的错误，他们如果驻在这些地方，你们应确实联络，共同计划一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这在现时的湖南敌人势力空虚时，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便是那部分农军已经远走无法联络，你们在桂东、桂阳一带应该单独的做起来，当地如有我们的党部，自然应该与他们计议发动群众采取适当机会举行暴动，假使没有党部，你们亦应由军中挑选得力同志派入乡村做组织群众鼓动群众的暴动预备工作，同时并派人与湖南省委作切实的党的联络。

五、暴动的局面，须看当地的环境，如便利在乡村发动，便应在乡村中力求深入和扩大，而不亟于攻城；如攻城确有把握而影响又大，群众或更因此而扩大，则攻城亦所必需。便是守不住几天，仍为敌人攻下，亦只得去做。

乡村与城市的暴动固然是最好的是能汇合在一起，但决不要彼此等待，尤其是乡村能发动时便发动，只要注意群众深入与扩大，农暴总是可以在乡村支持而扩大的，我们以队伍参加农暴，也须着眼于此点。

暴动的内容，自然应依照中央各号通告所指示的去做，但口号必须依照工农暴动夺取政权的原则，指定各种切实的口号，以合乎当地的需要。

六、万一你们所去的地方客观条件不容许一个农暴实现，即所谓统治军阀力量的强大，工农群众反抗情绪的微弱，党的指导一无所有的时候，你们的队伍便应向农运发达的区域移动，去发动群众，做成农暴的助力。这次同鸣珂同志同去江西省委代表，便在这个条件之下同你们磋商，将军队移往江西农运发达区域，如万安、莲花、赣州一带，去做农暴的助力，你们如认定湖南无发展农暴的希望，便可接受江西省委的提议。

七、假使你们已经与范石生发生了组织的关系，你们便应很坚决根据上述的使命，从他的军队中分化出来。这就是说不但将我们的军队抽回来，还将范石生的队伍拉出一部分来。这一工作自然是很难而且很秘密的，但我们必须很谨慎的努力去做。至少要将我们原有的队伍抽回来。指导机关应切实讨论迅快执行。

八、我们队伍中或者已经发生一些摇动分子不愿意过这种无希望于升官发财的流浪生活，你们应坚决的淘汰这些分子。假使他们不但自己摇动，同时还鼓动别人，你们

便应很坚决的执行军纪斩断恶根。士兵中如有厌倦军队生活而愿归家者，你们首应以土地革命后士兵家庭可分得土地耕种、工农革命军队待遇改良生活平等的希望去鼓动他们，更应时常引导他们与农民打成一片，引起他们参加农暴的兴趣，以巩固我们的军队。假使士兵有受敌人宣传的影响，图谋反叛或逃走者，便应立即予以监禁式的劝诫，并将解除的武装，武装热心农暴的农军。

九、你们队伍一切的给养，均应从豪绅、官吏、财主、地主身上着想，千万不要空想党会来帮助。这不但事实不可能，而且原则所不许。旧二十四师在海陆丰参加农暴，不但自筹给养提高了兵士生活，并赞助农民分配了土地，分配了地主的财产给贫苦无业的农民，这一工作你们应首先注意。

十、军中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你们必须依照从前的组织系统——团成立支部下分小组，师成立委员会——管理支部生活，执行党的政策，监督军队行动。

过去二十五师同志的许多行动多有可批评处，尤其是三河坝退后，直至现在许多同志的行动多应该拿到师委员会里讨论出一个大纲，交给全体同志公开的讨论给一判断，谁是谁非，报告中央核办。没有党纪便没有军纪，党员不能受严格的军纪，就无以处罚非党的群众。故你们对过去工作的审查，千万不要马虎一些。

一切党的政策均须拿到支部会议或小组会议中讨论，使每个党员都能表示意见，有些并可向非党的群众宣布，

使他们认识共产党的真面目和这部分军队正当的出路——工农革命军。师委会的组织以五人为合适，除指定朱德同志为书记外，余四人可由全体选举，但必须有个士兵同志被选。

十一、你们这一部分队伍的组织形式，广东革命委员会已任命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你们现在已到湖南，如果暴动占据了一个地方，即可由当地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政府任命为某某地工农革命军第几师，在这师中的一切训练，除了军事的正式操练外，必须有严重的政治训练，在非同志或不得力的同志中必须有党代表的派遣，严厉的执行监督任务。

十二、你们过去一切的情形均须做一详细的报告——给中央——给湖南省委，你们向中央要求要人材问题，中央可以供给，只要你们有信来，你们应派人与湖南省委联络，对中央，□□同志的任务完毕，即须回来报告，万一你们需要□□在那边工作，他可参加师委并任军队中一部分指挥工作。

一切一切都由□□面达，此次又不详写了。最后中央对于你们这一师死难的同志，特致最诚恳的哀忱和永不能忘记的心意，同时并祝你们后死的同志努力！

中共中央给 朱德并转全体同志的信(二)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广东省委来信，有你们部队已随范石生到韶关的消息，如果属实，则中央前信的指示，又有以下的变更：

一、广州的暴动，不曾严重的警告了范石生，但其对你们部队的注意的防范，并且前信所说：“广州暴动失败后你们是否不为范石生所解决，尚是问题。”目前范石生恐将实际的回答这一问题。为避免消灭的危险，你们只有坚决的脱离范石生，联络北江的农军及广州暴动后退往北江的队伍，参加北江区域的农民暴动，扩大和深入北江的土地革命，做成北江农暴的主要副力，造成海陆丰农暴割据东江的同样的局面，这是你们队伍存在和发展的唯一途径，并且对于广东全省总暴动的前途更有深切的关系，认清此点，你们必须迅速的执行。

二、你们在脱离范石生时，必须扩大这个“叛变”的影响到他的军中去，尽可能的带去他的队伍，拆散或消灭他的军队，即是保障和增厚我们的力量，这一良好的而又危

险的时机，你们也须谨慎的利用。

三、立即与广东省委接洽，直接受广东省委和北江特委（大约在韶关）的指导，完成你们对北江农暴应尽的责任，其余一切可参照前信斟酌实行。

四、假如同志中有怀疑脱离以及拆散范军的政策的人，必须无顾忌的予以开除，万一主持军队的同志领导着队伍反对这个决定，中央特命北江特委及□□同志行使非常手段领导服从党命的同志消灭这一个反抗。

周逸群报告(摘要)

——关于南昌起义问题

(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

一、八一革命之酝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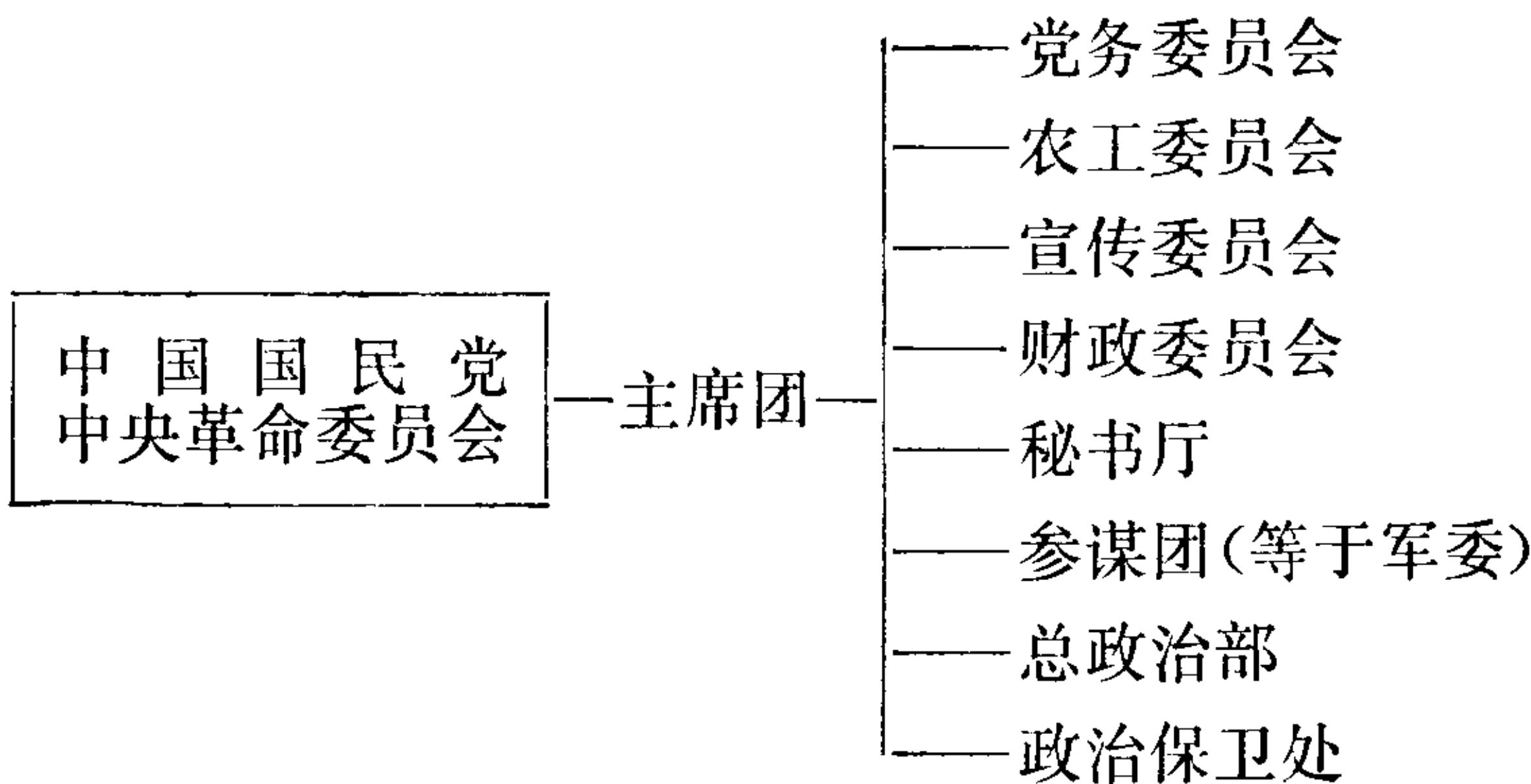
自七月十五日武汉政府正式反动后，文字上之宣传非常厉害。当时可为吾人所用者，唯二十军及十一军之一部分，但二十军在大治时其部下亦非常动摇。所幸其部下封建思想极浓厚，自师长以下莫不视贺氏为神人，故当时唯有利用贺之主张及言论以为宣传之资料。二十三日贺氏抵九江，黄琪翔、朱培德即邀其赴庐山开会，并百般拉拢。适平山同志在浔，乃由平山介绍各省代表谒贺，又得叶挺出来硬说，于是贺之主张更为坚决。二十六日贺抵南昌，贺、叶军队集中南昌时，适程潜部之五十三团亦赶到，似带有监视之意，贺氏大愤，决意解决朱、程部队，叶挺自然赞成。同时平山、代英、吴明等均住贺军部，真是无话不好商量。其中因对张发奎稍存顾忌，及张国焘同志到后，我党对张态度更为不坚决。其实当时贺氏对张并

不愿拉拢，其本心欲取张之地位而代之，曾向我们说道：“我们若要拉张则不必干，若要干则不必拉张，因我们此举是张氏不愿干的。”同时张发奎迭次来电邀贺、叶到庐山开军事会议，而贺、叶又不敢去，逼得不了，张氏来电准一日到南昌，于是大家才着急，决定要干（在七月三十一日正午始在军部决定），定于八一上午四时动作。于是由叶起草命令，用贺之名义（代总指挥）发表。殊贺之第一团赵营副，系滇人，竟于当晚将计划告送朱部某团长，又因朱培德侦察明瞭，乃临时改变，提早两小时。至晚十二时半，即发现枪声，敌人预先知道，当然有所准备，故直至拂晓，始完全解决。但当时即现不好现象，即第十师蔡廷锴部之二十八团故意与我教导团及第二团为难，连毙教导团团长学生各一员，并将军部马匹完全夺去。贺得报告后，即约叶挺商量，适上午八时蔡已到南昌，写一信送贺、叶请示工作，措词非常恭顺，贺即请其来军部谈话，叶亦在坐，结果表示合作，并即写信送二十八团团长，令其退还马匹，但尚有二十匹好马不退。这可见蔡之不是诚意合作。然而，我们总是相信叶的话，总以为叶既无意解决他，自然是无问题；殊不知事实上竟大谬，不惟蔡氏反了，并将已拿到手的三十团白送掉了。

二、政治军事上之组织

主席团及各委员会之名单，钱第筠或前委当有详细报

告，兹从略。



三、回粤路线之决定

八一下午七时在军部开参谋团委员会，我因不是委员，故不便参加。但事前钱第筠似乎也不注意这个问题，我自己也不注意这个问题，以为一定是吉安这条大道，首先解决朱培德部，以壮声威。殊知等我由外面转来时，他们（俄顾问纪功也参加）竟决定走抚州、瑞金、寻邬这条小路。我很诧异，即向贺龙、伯承、吴明等说出种种利害，并极端不赞成走这条路线，贺、刘等均为感动，允雷叶来部商议。殊知叶氏回部后，又召集他的军官开会，迟至晚上一点过钟才到。此时贺因一日一夜未睡，精神来不及，想睡觉，很不愿多谈话，只说：“你们商量，怎样决定，怎样好。”不得已，与叶直接谈判，无论怎样说，他总是始终主张走小路，并说已经向他的军官宣布了，不便改变，尤其是对蔡

不好翻悔，因为初次指挥他的部队，不便改变计划。我又向平山再三说走小路给养困难，平山当时也主张到赣州再回向东江也可以的，但是仍不坚决的主张走大道，于是只好就此罢了。但到次晨我又提出这个问题，叶挺、恩来、贺龙、伯承等均在坐，各人虽然反对我的意见，但也不十分坚决的与我一致主张，随后叶挺很不耐烦的向我说：“你早又不说，既已决定的事，你偏又来哓舌，你不怕摇动军心吗？”此时我心里虽然不服，因为怕摇动军心，只好不说了。

四、南昌出发时之景况

由三号起军队开始出动，叶系四号出发，贺系五号出发。当我们离开南昌时，因江西民众运动毫无一点基础，找挑夫非常困难，而得敌人子弹枪枝甚多，因此无法运送，于是为要多带子弹，只好每兵发给子弹二百五十发，甚至三百发。士兵因天气太热，都不愿多背子弹，竟有暗将子弹投弃者。据贺氏云，仅军部特务营由南昌至瑞金并未作战，而损失子弹达三万余发，其他各团可想而知。方由南昌出发，炮兵营因拉夫出发稍迟，又不与后卫联络，致被溃兵抢去“大正六年式”山炮一门，平射炮两门，子弹百数十发。此二十军绝大之损失，且炮兵营长因此失踪，或为敌所获被害亦未可知也。由南昌至抚州，本规定四日到达，乃江西道路非常长，每日虽云走六十里，合之川黔道路不

啻有八十余里之远。兵佚因负担太重，沿途倒毙者甚多。又卫生队无人挑卫生材料，以致病者无药，死者无人安埋，其惨况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职是之故，官兵心理颇为灰心，甚至怀疑革命者有之。军纪非常不易维持，以致沿途拉夫鸣枪之事时时发现。贺及参谋团同志见如此情况，乃改为五天到抚州，然亦人困马乏无复生趣矣。贺之部队除原有五团老兵外，尚有第六团纯系新兵，其官长均各被压迫来者；又教导团为新招来之学生四营，在南昌编来之补充兵二营，其官长均黄埔学生。此等新兵新官，如何能受此等苦楚？故至抚州时，教导团仅余学生八百余名，第六团亦仅余兵七百余名，将近损失一半。未曾作战，而有如此绝大损失，未免令人惊异。贺不得已，要我就师长职，并拨该两团受我指挥。我要求后半天出发，以资整顿。由抚州出发，大家感觉江西路途远长的苦痛，乃改为每日平均走四十里，至多五十里。经宜黄、广昌以至壬田市（距瑞金四十里）始与敌钱大钧部接触。

五、壬田市之役

先是，我军由广昌出发，分两路前进。十一军为右纵队，二十军为左纵队，约定八月十八日在壬田市会合入瑞金。适钱部之五十、六十两团在壬田市之前方布防，意欲堵截我军入粤。十八日上午，贺亲率一、二两师全部及第三师教导团一、二总队攻击前进；我率教导团第三纵队

及六团全部掩护；革命委员会同进。十八日下午与敌接触，敌虽兵力两团，而训练颇好，故能顽强抵抗，至次晨始退却。是役十一军到得太迟，二十军几为击破。叶挺与我同时到达壬田市，而战事已告结束。我军第三团团长阵亡，第四团团长受伤（到上杭才死），其余连排长伤亡十余人，士兵百余人。十九日，革命会及后卫全部到达瑞金城。当时敌向会昌方向退却，由朱培德率教导团一、二总队担任追击，至距瑞金五十里地之谢坊为止。

六、会昌之役

敌钱大钧部一面败退会昌，一面将后方部队集中会城。当时我方有两个意见：一、贺、叶、刘、周等主张攻击会昌之敌，并图歼灭之。二、俄顾问纪功主张避战，速到汀州、上杭入粤。争论结果始多数决定叶部即日向洛口前进，第四、五两师为主力军，攻击会昌之敌，一面由我率教导团第六团及第二师之第五团为佯攻部队，约定二十四日拂晓同时向该敌施总攻击。敌之主力约六千人，约等于我方攻击部队之兵力，上午六时我佯攻部队先与敌接触，七时半始闻极右方有炮声，知叶部已与敌接触矣。但敌人顽强抵抗，直至下午四时叶部始入城，缴敌械千余，俘掳九百余，遗弃辎重甚多，但未得现款。敌人向寻邬退却，我军仅追出三十里而回。二十五日我回瑞金。二十六日敌人不知会昌已失败，又由洛口开到二千余人，被十一军击

溃。二十七日下令全部折回瑞金，经长汀、上杭入东江大埔、三河坝以至潮汕，沿途在高阪与敌小接触。当我军进至三河坝时，潮汕之敌已准备退却，盖潮汕无险可守，从古以来未有人背死守潮汕者，故王俊甫到汕闻我军将至，即分路退却，一由留杭退至汤坑，一由海道退出。

七、入潮汕之布置

当我军到三河坝时，明知松口有敌人而不向彼攻击，且反攻为守，留朱德指挥扼守三河坝监视松口之敌。当我军到达韶关时，王俊正由韶关退却，但我军不顾，不派队追击，即全部入潮汕，予敌以集中之时间，此战略上之大错误也。入潮汕后又不迅速出击，迟至二十八日我主力军始由揭阳向汤坑之敌攻击。二十军第一师先与敌接触，占领距汤坑十余里地之分水，缴械百余枝。我二十九日下午接到命令，大意谓敌新编第二师及十三师，二十八日由汤坑至韶关，向潮州前进，至快亦须两日路程，预料二十九日晚或三十日上午必与我潮州部队接触；令我死守潮州，并派七十团之第一营协同死守。潮州无险可守，因命令如此，只好勉强支持待援，因命令说明我主力军准于二十九日拂晓向汤坑之敌攻击，将该敌（王俊部）歼灭后，即不分昼夜向敌追击。待至三十日上午九时敌人与先头部队教导团之第三总队接触，至十一时敌人猛烈向我攻击，始命第一总队增加，以二总队扼守铁道，一面电调第六团，至

下午三时许敌约一团由山后开扩地向我前进。此时子弹已罄，机关枪大炮俱失效用，至三时半师部被包围，教导团溃散，我乃率马弁数十人冲出，五时余始冲出城，由河边退却，行得十余里遇溃散之第六团第四连，因该连到后，即被包围，敌众我寡，始由铁道退却。我当时以为主力军或者因疲劳迟到，七十团之第一营不知何故始终未到，尚以为主力军无论如何不会失败。殊知次早派人到潮州，未闻枪声，始判断我主力军已失败。此外汕头正为敌人占领，随我者只长枪二十二枝，多半无子弹，拔壳枪十四枝。因被敌人阻塞，不能与我大部队接近，只好流为土匪。殊知广东民团非常厉害，无处可以安身，不得已将枪枝弃置河中，改装至汕，于五号始乘轮来沪，询之同轮者，始知主力军已在揭阳大败，伤亡甚大。二十四师为本军基本部队，该师损失特大，而叶有负伤消息。其军部机关枪亦被缴去，狼狈情形，可想而知。

八、失败之原因

(一)我军以避战为目的，故士气不振。且由小路回粤，交通不便，给养困难，以致损失甚大。行军亦太迟缓。(二)二十军习惯太深，旧系军官与新来军官冲突日甚，时时发现排挤新军官之事，以致内部不一致。如会昌之役，二十军第二师师长秦光远并未赶到，几使我第三师全部消灭。行军亦不按照时间，失去机会不少。(三)不敢

根本消灭敌人，如会昌不跟踪追击，陷隍王俊败退，亦不追击。因此，钱王势力得保一部分，牵制我军不少兵力。
(四)侦探不确实，如汤坑之敌不仅王俊部，尚有黄绍竑之桂军，以致潮州令我死守，结果兵力不能集中，被敌人各方击破，使第三师全部溃散，不能集合。

九、党的组织

钱第筠之下，各军设军委。军委之下设师委，师委之下每团有支部及分支部小组。二十军中以第三师党务最为发展。在潮州时，全师达五百余人。每遇休息时间，必请平山、代英等公开讲演。又常开党员大会，请恩来等做报告。故虽在行军作战之时，党务尚未停顿。但一、二两师则因封建思想太浓厚，习惯太深，不易发展组织。惟一、二两师长颇富于投机性，屡次表示要加入本党，但至今尚未正式加入。□□□□□□□□□□□□□

十、沿途行军对土劣之处惩

我们根据土地革命之精神，沿途对土劣也毫不客气，捉来不惟罚款，还要枪毙。但是消息传出去，土劣早已跑了。故沿途不过抄家没收而已。此等任务，全交政治保卫处办理。

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摘要)

(一九二七年)^①

叶挺

(一) 经过的情形

1. 暴动前武汉的情形

北伐军到达两湖后，工农运动有突然的发展，才使一切反动势力（富有的阶级地主军官）结合而向工农进攻，尤以革命政府及军队内十分之九的军官为甚。在武汉政府未进军河南时，我们军队同志的集会已提及这个严重的问题，但党对此并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当时武汉政府有保护军人财产的命令，我们的党已由此逐渐取一个退让的政策。至武汉军队大部集中河南作战，夏斗寅袭击武昌，许克祥叛变长沙，武汉的政府及军队益为动摇，湖南的工农及我们的同志，已决心进攻长沙，消灭唐生智的势力，当时我

① 日期是编者所加。此件原保存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一九二七年卷内。本文是按原稿摘录的。——编者注。

们的党仍主退让并制止勿动。惟此时鲁易同志意思，愿意实行帮助湖南农民暴动，夺得长沙后再交给唐生智，后来并未实现。

及至河南战争幸获胜利，但冯玉祥得与蒋介石联合，而反对武汉政府。此时武汉政府益趋险恶，两党的分裂已成万不能免之势。但我们仍是让步，保持合作，并没有坚决的作进攻的准备。

此时武汉政府的策略是“分共”、“讨蒋”，分共已实现了，遂去进行讨蒋，当时我们党的意思是主张集合我们的武力，依张发奎回粤徐图发展。

当时我们军队的武装势力：

张发奎所部内共九团——；

湖北警卫团一团；

程潜所部二团；

公安局的四百枪；

政治军事学校约一团；

工会纠察队约一千余支枪；

襄阳方振（武）所部一师长是我们的同志，亦有一部分的力量；

陈嘉祐所部约两营；

农民训练所学生约五百人，有枪；

其他各处工人、农民的武装未计。

2. 暴动前的准备

至七月二十号左右，我们的军队因讨蒋的任务，集中九江者，约六团，张发奎已实行分共的政策，令我们著名的同志退出共产党。此时我们的负责同志，因武汉形势险恶，多到九江。由谭平山召集一个谈话会，参加的有邓中夏、李立三、聂荣臻、叶挺等，多主张令我即刻联合贺龙的军队，向武汉政府示威，作一个革命的许克祥，表示我们反对分共的主张，保持国民党的三大政策，胁迫张发奎赞成这个主张，反对武汉政府。并有主张不待中央命令，即刻发动的。最后决定准备待中央命令一到即发动。但谭平山未得中央决定，已将暴动的一切计划，告诉贺龙。

此时我们及贺龙的军队，奉张发奎的令向南昌一带集中，我们中央在此发表反对分共的主张，并仍企图让步，挽救时局的危机，如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并令鄂城、大冶各处武装工农编入贺龙的军队内，对我们在张发奎所部内的负责同志训示谓“如果张发奎能够不拥护汪精卫，则我们可以与他合作回粤，否则实行脱离关系。”

周恩来及恽代英同志奉党令由汉口来南昌，与谭平山、叶挺、聂荣臻等负责主持我们的军队及党的指挥，并由谭平山、韩麟符等负责召集国民党的左派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省党部负责代表，准备组织国民党政治及党务机关。此时就接到张国焘一来电，谓张发奎仍有希望，南昌暴动应待彼自己到后再决定。彼于七月三十号(?)^①赶来南昌，

即开党团会议。张国焘同志谓，国际代表的意见，谓我们的军事若无十分把握，便可将我们的同志退出军队，去组织工农群众。周恩来同志听着大怒，谓“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罢。”谭平山同志则大骂“混蛋”。张国焘同志谓，这个运动，关系我们几千同志的生命，我们应当谨慎。最后由李立三同志解释。决议仍主张于一号发暴，由贺龙、叶挺、谭平山、周恩来组织国民党内的特别委员会，主张〔持〕这个运动，并决于一号发动，暴动的计划，先用武力解决武汉政府倒下。

3. 在南昌的军队(即第三、六、九各军共五团，由此威逼张发奎与我一致主张回粤及反对“分共”)

八月一日上午二时解除武汉军的武装，发生激烈的战斗（因贺龙所属一营长在事前泄漏机密，敌人已有严密的警戒）。至天明即将南昌城肃清。贺龙所获枪约二千支、子弹十余万发，我们所部获枪二千余支，共五千支，子弹七十万发，大炮数门。

同日由谭平山用中央执委名义召集中央执委及各省党部左派分子开联席会议，承认特别委员会的处置，并组织革命委员会执行党务及政务，以谭平山为主席，以贺龙、叶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周恩来亦为军事执行委员，刘伯

① 问号是原有的。——编者注。

承为参谋长，以恽代英、林祖涵、郭沫若等，担负政务、财政等工作，此时革命委员会内并有张发奎、朱挥（晖）日、黄琪翔等为委员。

张发奎闻变，即偕十一军军长朱挥（晖）日由九江至马回岭，以防二十五师与我们一致行动，二十五师之七十三、七十五二团是我们的力量，遂由七十三团长周士第同志，率领向南昌集中，适与张发奎乘车相遇，即将其卫队全部缴械，纵张发奎及朱挥（晖）日步行回九江。

二号早，二十五师之两团到达南昌，与在南昌之第十师、二十四师合共八团，贺龙所部共六团。此外二十六师之一团，警卫团二团，政治学校学生及湖南之农军约千余人，程潜所部之两团均不能及时赶到。

事变后我们知不能与张发奎合作，才决定回粤。因此时朱培德所部四师，在吉安一带与李济琛所部钱大钧、黄绍竑各军，共约十三团对峙。最初本拟利用交通便利，由吉安、赣州入韶关直取广州，但计算敌人兵力较多。纵能将朱培德所部，李济琛所部完全消灭，但到韶关后，李济琛利用粤汉铁路之便，可以集中五师以上之兵力与我决战，我们必不能取胜。且张发奎所部两师尚可以蹑我后路，更无法应付。最后决定取道江西东南部山路之粤之汕头。

八月五号离开南昌，第十师乘机脱逃，并将我们同志完全驱逐，投降蒋介石。又军队骤经变故时候，未作适当的宣传，故逃亡颇多。由南昌所得之军械因运输困难，大部均遗弃于敌人。

八月尾到达瑞金，贺龙所部先与钱大钧所部一师遇战，钱部虽败，但损失不大，退至会昌。十一军所部五团及贺龙三团，复奉命向会昌敌人进攻，此时钱大钧、黄绍竑全部共十三团向我抵抗，因黄绍竑所部未能同时协同动作，我们军队才得将敌人各个击破，钱大钧几全军覆没，黄绍竑所部亦为我们军队击退，但损失不甚大。此时因携带空枪太多（十一军约五千五百支，贺龙约二千支），若直接由江西回粤，因山路运输困难，无法携带，才改道折入福建省汀州，利用水道运输，并以二十五师护送。

至九月十四号大进，到达大埔，在军事地势上本不应直入潮汕，应先占领其北部，将敌人主力消灭后，再行南下，因潮汕沿海之区，军队运动非常困难，且无退路，但因看潮汕空虚及不明敌人情况，才先直入潮汕，而令二十五师留守三河坝以保护我侧背。将到潮州始知黄绍竑所部七团已由江西直入平远，我们才决定占领潮汕后，即急回师以击此敌。但至潮汕后，因筹款关系延迟四天，始集中揭阳，拟向兴宁前进，但此时李济深复添加八团之生力军已到达兴宁，与黄绍竑所部七团、钱大钧约二团、何辑五之潮汕守备队约两团，互相连络。而我们二十五师正走在三河坝离潮州四天行程，无法可以集中。此时形势实至万分险恶，我才提议放弃潮汕，集中我们兵力，并将多余空枪悉运至海陆丰一带交给农军，但此提议因负责同志不赞成，才至以二团之兵力留潮汕（约千人），且存枪亦未运到，后来全数都“送”给黄绍竑了。

九月三十号与陈济棠军约八团激战于汤坑（离潮州约九十里），敌人正面第一道防线遂为我突破。因不能协同动作，又因两翼为敌人所包围，而官兵伤亡太多，遂不得不下令引退，但敌人亦因伤亡甚大同时引退，并未向我追击。退回揭阳后，因得汕头的报告，说潮汕尚安，遂决心经潮州退福建，星夜赶路，但未至潮州，敌兵已占领该处，遂折向海陆〔丰〕方面前进，但因官兵三夜未睡，且难得行军，序列大混乱，中途遇一隘路，贺龙所部已悉落后，二十四师忽为敌兵所截击，损失甚大，仅余二千余人，枪约千支，绕道向海陆丰与农民组织连络。

留守三河之二十五师，于十月三号为强敌所攻击，血战两昼夜，伤亡过半（敌人死亡亦过千余人），不得不向福建引退，企图与我潮汕之军联络，及后经江西入湘南，中途又为敌兵所截击，现余枪约六百支，在湘粤交界之区。

南昌暴动始末记（摘要）

（一九二七年）^①

刘 伯 承

小 序

南昌暴动，是中国无产阶级夺取领导权在历史上的第一页，可惜是失败了，在这当中牺牲了若干同志，换得来的是什么？可以说是失败中求得的教训。我是参加南昌暴动负军事责任的一人，报告此次军事上之经过，为的是供我们的党在失败中研求教训之材料，以作此后革命进行之取鉴，但作这报告有三个缺点：

一、南昌暴动，我是被四川贵州军阀围攻失败刚逃出来参加的，暴动前之经过我不能详尽叙述。

二、失败时军事记录全失，此是凭回想叙述出来的，关于数字，不能正确的指出。

三、失败后未能同各负责同志共同讨论得一个很正确的结论，此是就个人知道的说出来的。

① 日期是编者所加。此件原保存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一九二七年卷内。本文是按原稿摘录的。——编者注。

南昌暴动军事报告的目录

一、南昌暴动之前

- ## 1. 政治方面 2. 军事方面

二、南昌暴动

- ## 1. 党的决定 2. 八月一日

三、由南昌到广东

第一期 南昌——会昌 第二期 会昌——
流沙

四、结论

附：由南昌到广东军事简要表①

一、南昌暴动之前

1. 政治方面

自蒋介石叛变，在各处演屠杀案以后，当时与之敌对而尚在革命道上者，自然是武汉国民党政府。我们为强大自己的力量，扩大无产阶级的组织，分裂国民党对广大农民之领导，创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条件，自然该拥护他，保持我们革命的联盟。但是武汉国民党之分子，如徐谦、谭延闿之流，恐比南京方面的人物更右得多。至于汪精卫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提到土地革命就摇摆不定。总之，

① 见 110 页。

他们离开革命队伍，是时间问题，离开的形式，自然的是与我们实行斗争。我们在他们未离开革命队伍之时，革命的联盟，不生问题，但在事前要时时准备着他们离开革命队伍时的斗争，代替国民党的领导。可惜我们的党胶执了联合小资产阶级表面上的一点，而无这样准备。自五月二十一日许克祥在长沙屠杀农民起，经过郑州会议、徐州会议，一直到唐生智回湖南，由查办许克祥变为驱除共产党的主张，武汉政府亦默认许克祥之屠杀农民为自卫，并下令军官监督政治工作人员，秘密开会者枪毙，解散工人纠察队及军事政治学校，并缴其枪械等等，我们的党，才根本消极的对武汉政府失望。其实自郑州会议以来，武汉政府也随着南京变成屠杀工农的机关，国民党完全变成反革命的团体，既然是与我们联盟的条件相反，联盟关系应该断绝，趁他们有事河南，指导群情激昂的工农、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工人纠察队以及张发奎军中及其他同志的队伍，在工农有力军事要点之两湖暴动起来与他们斗争。不应站在两湖及其他工农群众尾巴后面若干远，听他们屠杀以及解除我军事政治学校、工人纠察队等等武装。自然是这样一来，对南京及各方面不能说无困难，但总比迟至甚么力量也消沉时，才在南昌暴动好得一点。我们的党已经没有刚才所说的准备，到了武汉国民党清党事起，同宁汉国民党有第三派运动成熟，各方都已联合好了而不容我们，而我们力量也消沉时，才有联结张发奎到广东的准备，张发奎亦有护送共产党首领出海口这样滑稽的话。

2. 军事方面（仅与南昌暴动有直接关系的）

- (一) 反革命的（详于反革命的环赣兵力概要表）^①
- (二) 参加南昌暴动的（详于参加南昌暴动兵力概要表）^②

二、南昌暴动

1. 党的决定

我们的党曾看见了长江流域及其北方皆已成为反革命混战所在，以广东（一）占军事地理上之优势，（二）工农运动之核心，（三）财政之丰裕，（四）交通之灵便等等，因决定以我们同志的军队规取广东为革命根据地，就组织一个前敌委员会，在军中指导一切。首先对张发奎犹未绝望，以为可以使之左倾，同到广东，及见汪精卫在九江拉拢了张发奎敌视我们，我们党才决定离开张发奎，将上一表内四部分军队在南昌暴动，单独打到广东去，打到广东的计议：（一）工农力量在东江的厚，（二）东江地形较北江平易，且敌军已集中于北江不能各个击破他，（三）东江海口便利，可望苏联接济，财政亦丰，（四）可以以福建为后方。因此，决定迅速的先取东江，充实力量，次取广州。

① 见 106 页。 ② 见 107 页。

2. 八月一日

我们党的前敌委员会，令叶挺、贺龙等军队于八月一日午前二时围攻朱培德、程潜在南昌之队伍约三千多人，拂晓即经缴械。在此时，蔡廷锴及其军官有些还是不稳定的，贺龙等主张，一并扣留制裁者，终未实行，以致演成进贤叛变的事来，为后来失败一种原因。那天战事结束就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提出没收地主二百亩以上之土地的口号（后来到东江有个农民听着这口号就说，这是耕者无其田的口号），裁去一切苛捐杂税，提取政府银行之存款（现款数万，纸币三十万之谱）。此次英勇的暴动，谁也知道是我们党的领导，应该明白的将我们党的真面目及政治主张宣布出来，但仍挂上屠杀工农的国民党头衔及畏缩右倾的土地口号，真是一件恨事。在当时，以为拿出来我们党的真面目及政治主张，恐怕吓退了小资产阶级，抽了革命联合战线的力量，其实反减少了我们党在工农群众的信仰。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组织（详表见第 108 页）

三、由南昌到广东

参谋团委员根据上述迅速的先取东江次取广州之决议，讨论是取道吉安、赣州取东江，或是取道临川、会昌取东江，结果决定由临川、会昌取东江，其理由是：

(1) 吉安、赣州等地在上流方面，容易联合与集中的敌军将达四万（在粤汉道上李济琛嫡系不在内），我军兵力仅达二万（战斗兵员尚无此数），逆队攻之难操胜算，且对南昌下流有张发奎等一万以上敌军追击的顾虑。临川、会昌路上仅有杨如轩、赖世璜不满三千之无力敌军，容易应付。即敌人从他处调兵击我，陆行同等困难，我可各个击破它。

(2) 交通上赣江虽比抚州河长，但同一上水，无多汽船可供使用，陆行则临川、会昌路线较直而短，迅速可到东江。

(3) 江西农运均属不好，临川、会昌一带，较吉安、赣州一带尤为幼稚，如我军与集中之强敌相遇，望之扰敌均无把握，给养上吉安、赣州一带比临川、会昌充分，但秋收之时，临川、会昌路上并不困难。

(4) 取道吉安、赣州接近湖南地境，与湖南农运力量自然容易联络，但迅速到达农运更好之东江，才是我们之目的。况此道最可虑的，我军湘籍军人占大多数，无政治认识者不少，有时叛逃之可能。

第一期 南昌——会昌

参谋团基于速到东江之企图，在南昌定好行军计划，是由南昌——临川——宜黄——广昌——石城——瑞金——会昌——向寻邬，计长一千二百里之主要道上，选的平行路，预计八月二日由南昌出发，二十六日集中寻邬，毕竟

运动迟缓，到了二十六日才到达寻邬后方二百八十里之瑞金，途中又损失了许多军械弹药，叛逃了许多官兵，尤以南昌至临川一段为最。损失军械弹药的原因：（一）不能得多数力夫运输，（二）官兵未经训练者抛减其携带武器。叛逃官兵最著者，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在进贤叛变，归陈铭枢去了（解除我们同志在其部队之职务），我军就完全损失了战斗力强之一师。又第二十军参谋长陈裕新及第二十军第五团约七百人，都叛逃归唐生智去了。其余概是零星逃散的，兹分析叛变的成份：

（一）反动派，如蔡廷锴、陈裕新之流。这是我们在可能范围内，未取革命的断然手段的罪过。

（二）无政治认识之营混子，感觉生活太苦而规避者。这是我们无管理训练的罪过。

（三）因病落伍者。这是我军军医散失逃亡，卫生上设备不完之所致。

八月七日，我军到临川时，杨如轩军队约二千人不战而逃，往南城去了。我军给了农协一些武器，并委有众一千余人之土匪邓甘霖为赣东警备司令，令之协同阻扰敌军之来。

八月二十五日，我军到了壬田市，当时李济深与朱培德、张发奎妥协好了，已调他的右路总指挥钱大钧的七千人并附以由东江调来之苏世安、柏天民之两团，约二千余人来会昌、瑞金，其先头在壬田市布防堵截我军。又调他的中路总指挥黄绍竑的九千人，由赣州经雩都向我军前进

中。张发奎的军队由黄琪翔统率，由南昌到了吉安，拟定回广东的。此时我军贺龙的兵力约有五千六百人，叶挺的兵力约有七千八百人，两共约一万三千四百人，而战斗兵员则无此数。但欲乘钱大钧等兵力未集中而各个击破之，在壬田市就开始攻击，二十六日就攻入瑞金。可惜叶挺的军队未能依定时完全到齐，只贺龙的军队担任攻击。敌人未被歼灭的由瑞金向会昌退却了。在这时，又恐钱大钧再由会昌退回雩都，歼灭他不了，遂决定以叶挺的全军从西江市、洛口迂回其后，攻击会昌。贺龙的军队由瑞金正道攻击会昌。叶挺军于二十八〔日〕取得洛口，此时黄绍竑的军队亦由雩都拟经洛口向会昌前进，而以主力猛攻会昌。贺龙所部担任攻击的一方，因他未照预定计划由瑞金派出兵力，只派得有周逸群所指挥之一千余人攻击会昌，又被钱大钧击败了。好在叶挺方面军队质量较好，又迫于前后皆敌，死力奋斗，得于八月三十日午后五时，攻入会昌，并派兵团〔尾〕追至筠门岭。此两战钱大钧指挥的军队，除伤亡俘虏逃散的约六千人外，只剩得约三千人，向南逃窜。后来才知道，这三千人是分往武平、信丰窜梅县去的。此时黄绍竑军到洛口，果受了叶挺军的一营的欺骗，被抑留一日才攻取洛口，又探知会昌被我军攻克，遂未前进。此役叶挺军缴敌枪约两千，伤亡自己官兵约一千，以我们同志为最多。贺龙军于攻瑞金、会昌共缴敌枪约五百枝，伤亡自己官兵约七百余，也是我们同志最多。暴动时已感觉军事人材之缺乏，这次战争伤亡更感缺乏万分。

我军得著了此两战胜利，何以不于此时照原定计划，取道寻邬入东江，而改由长汀上杭入东江，其理由如下。

(一)经此战役，叶、贺两军共有兵额一万一千六百人(战斗兵员无此数)，最好与黄绍竑之九千人决战后再入东江，但侦察该军知会昌已失，屯驻洛口不动，有抑留我军之模样，攻他则其退路安全，必扑个空，反迟延我们到东江时日，致敌人在东江有充分之准备，不攻他而追敌由寻邬入东江，则该军必尾蹑其后。取道长汀、上杭，则无此顾虑，且无其他敌人之顾虑。

(二)由瑞金经长汀、上杭入东江，较由会昌经寻邬入东江好得多，且其路长并不大于寻邬，其中有继会昌到瑞金九十里之旋回，然顺鄞水而下韩江船可载大批战利品——枪枝(在五千枝左右)与大批受伤官兵，得迅速的到东江，不然无力夫以过寻邬山路，枪械、伤者均无办法，况该军有蹑后之趋势必致遗失。

(三)我们此时不仅是在得米粮供给养，而且是在得现款分给士兵零用，长汀、上杭富饶，可以应求，而寻邬瘠苦则不能也。

(四)我军到寻邬集中之计划，为第二十军叛逃参谋长陈裕新告知武汉政府，披露各报，有改变计划之必要。

(五)福建为省中无力民军角逐之地，当时各有力军阀皆无兵驻其间，直可谓无主之物，取道长汀、上杭，后方安全。

有人事后说，当时就由长汀入据漳州一带，充实兵员

后再取广东，也是一个办法。但军事是根据政治上决定的，由东江取广州是党于事前由政治上决定的，广东方面工作亦根据这决定有相当之准备，所以无人提议及此问题以外的事，且在当时兵力太弱，迫切需要者在兵员补充，欲其速得，不能不望之联合于东江农军，故必速到东江。在事后看，就到漳州谁也难料敌人不立刻来福建作战，不过我们起初估量广东能调来东江与我作战敌军只有一万左右，这是失之于小，估量东江农民力量满能积极的阻扰敌人，牵制其若干兵力，这是失之过大，都是我们的错误。至于说到对敌谍报勤务，在南由上海派到广东去的同志不少，望他陆续迎头报告，结果我军到汕头〔没〕有一个人回来。又广昌派作谍查同志领了钱未去，也不来说明未去的理由，结果查出来不加处罚，党的纪律不严，谍报亦等于零，这尤是我们军事上的缺点。

改道长汀、上杭入东江的计划，是八月三十一日决定开始实施的。九月二日停顿洛口之黄绍竑军突来攻击会昌，数小时不克即又退去，这也是抑留战术之表现，叶挺军伤亡二百余人，此时我军先头部队已向长汀出发在途了。

这一期由南昌带出的现洋仅数万，不甚值价之纸币，大概是三十万之谱，分发为各军的给养，曾在宜黄、临川议定，先用纸洋收买地主谷米，或无代价征发其粮食，现洋则保存，最后在作战地区使用。将领有以王者之师自居，认征发为羞耻事者，对地主亦禁用纸币。于是现洋不

久用完，纸币离南昌愈难使用。负责筹款者，在旧的普遍派款，新的剥削地主勒款两办法之间游移不定。且途中倥偬，有钱者大半逃避，于是筹得之款甚微，不敷用度。至瑞金后，越感困难，影响于行军之迟缓。最后是粮秣管理处开始征发地主食品以供军用。

广昌以北曾见农运组织，但极幼稚，曾雇少数农民为力夫，其他无所表现，至在广昌以南为赖世璜的反动军队驻防之下，无甚农运组织，且其他在蒋介石命令实行清党，在民众作反动宣传十分厉害，傍路居民逃避极多，我军来在一地停驻，无从作我们党的宣传。革委各机关及各军中负政治工作者，只得照例写得一些解放农民条例全文，没收二百亩以上之土地，继承国民党正统，打到广东去等等标语，顺道贴在路旁，这样工作自然不能生何等影响。对各地国民党，虽尽力寻得本地几人出来重新改组，但他们看得我军是要走的，也只好敷衍我们而已。各县县政府之组织委员也是因我军过道，是暂时的，除了我们自己派人主持一二日以外，其他寻得本地的几人也是办党的，一样敷衍我们。

第二期 会昌——瑞金

由瑞金经上杭、大埔、潮州、汕头是八百五十里，九月五日贺龙的军队大部分由瑞金到长汀，叶挺的军队大部分由会昌开回了瑞金，相距八十里。当时福建、长汀、上杭一带之民军，蓝玉田、孔庆辉两个武器甚坏的队伍约一

千人，于我军未到时逃向远城、武平去了。我军因为将负伤官兵暂留长汀医治，恐其残害起见，曾由我九军副军长朱德（是我们同志，在南昌受革委委任令其收编杨如轩军队者），委任他两个为某司令以羁縻之。又在平远有张天齐领有匪及被迫农民数百人，令其探察黄绍竑军队之情形，并阻挠其前进之企图，亦由朱德委之为某团团长。由瑞金到三河坝一段未有战事，唯我军以瑞金、长汀陆路八十里，运输伤者之困难，长汀、上杭之筹款困难，在长汀停了二日，在上杭停了三日，叶挺将第二十五师窝在后面，停得更久。我军到大埔时，他还在长汀、上杭的路上。这也是后日他迟来三河坝，与主力部队远离，不易联络的原因。

九月十八日，我军在大埔县署检得薛岳的电报，知广东方面来的敌军是向河源集中的，又据各地同志报告，兴宁、五华在农军占领中，高陂、普宁、揭阳农民暴动失败，汕头工人已炸坏潮汕铁路，海陆丰尚在暴动农民手中，平远、蕉岭皆无敌情，惟梅县方面有钱大钧残部约三千人，潮汕敌军王俊有兵四团，向三河坝移动。

三河坝是三河合流处，交通枢纽，我军于九月十九日占据的，占据时敌由潮州乘汽船来此，被我军击退。此时我军全体约一万零七百人（叶挺兵员约六千三百人，贺龙兵员约四千五百人），除叶挺之第二十五师约二千五百人尚在上杭途中外，到大埔与三河坝者全体约八千五百人，而战斗兵员只六千余人，军事讨论，均觉得：

(一) 兵员之补充重之工农。
(二) 交通要灵敏，而尤在于得外面的消息。
(三) 财政困难问题之解决。
(四) 械弹之接济。
(五) 革命委员会之驻地。
(六) 揭阳、普宁、海陆丰农民暴动之联合行动。必须迅速取得潮汕，要取潮汕主张有二：

(1) 就东江战事历史上看，东西两军均重视兴宁、五华，以该两县地形上占优势的缘故，今广州之敌集中河源方面，此方尤宜注意。我军以一部肃清潮汕，而以主力趋兴宁、五华方面。

(2) 集中河源方面之敌，到兴宁与河田，皆有可能。据报，兴宁、五华方面，现刻尚无敌情，潮汕方面，王俊的兵有四团约四千人，曾有一部在三河坝与我接触，今我军到达前敌，战斗兵员只六千余人，如以主力趋于无敌情之兴宁方面，而留一部肃清潮汕，殊无把握，果受挫折，前途更难应付。宜一面催第二十五师速到三河坝防制梅县方面钱大钧之残部，探察平远方面黄绍竑军之来否，并作趋兴宁方面之准备，一面将我军已到前敌之部队迎敌攻击，迅速取得潮安后，不停留的开向揭阳、汤坑，攻击由河源前来之敌是来得及的，以此再与三河坝之第二十五师联络，亦属容易，潮汕方面，则留少数部队卫戍。

结果是依后一计划，在实行时，仅在三河坝隘隍之间小有战事，于九月占领潮安，王俊部队由潮汕分经隘隍、

揭阳向汤坑退却，如果我军照预定计划在潮州不停滞，即一齐向揭阳、汤坑前进，二十七日即可在梅江与三河坝之第二十五师联同作战，乃事实大谬不然，有些在政治方面的同志，忽视军事的说，军事不成问题，只看政治如何主张。而武装同志大多数感两月长途困苦，一见繁华的潮汕，不免有留连休息筹款给兵之表现。非同志之表现尤为不好，怠慢迟延，本可二十四日集中揭阳者（潮安距揭阳七十里），竟至二十七日尚未完全集中。这是我军遭大大失败的罪过。

据各方报告，黄绍竑军由会昌开到平远，钱大钧军尚在梅县。

河源方面之敌似已由紫金向畲坑前进。

第二十五师是二十二日完全到了三河坝，我们命令他牵制该方面之敌，潮汕方面则留第三师周逸群统率的一千人戍守（叶挺派往普宁协助农军及留潮汕者约八百人），我军集中揭阳者只约六千五百人（叶挺的三千人，贺龙的三千五百人），战斗兵尚无此数，于二十八日由揭阳向汤坑前进，距汤坑尚有三十里之白石，与敌军遭遇获敌俘虏，据称敌军大部有已取直隄隍往取潮州者。于是命令周师长逸群指挥潮汕戍守部队，死守潮安并调回帮普宁农民斗争之一营到潮听其指挥。

又命令三河坝之第二十五师沿梅江袭击敌左侧背，我军拟迅速击破白石之敌后，由韶关追随该敌以援潮州。

激战至二十九日始攻入汤坑，拾得敌计划，李济深他

仍是：（一）以钱大钧三千人在梅县方面牵制我三河坝之二十五师。（二）以黄绍竑之九千人由平远经丰顺、隍隍以取潮州。（三）陈济棠指挥他的十一师之四团代理十三师长邓世增之两团、新编第二师师长薛岳之两团及潮梅警备司令王俊之四团共一万五千余人，经河源、畲坑、汤坑趋揭阳，这面兵力几乎三倍于我，所以他始终取两翼包围，我军始终取中央突破，节节胜利，终未突破。至三十日午前三时，叶挺暂令其全部再突，亦不果。但两日夜之激战，我全军伤亡官兵二千余人，已无力再战，只得向揭阳退却。但敌人的损失亦大，在事后看报，黄绍竑说，如再战半日，他们是不能支持的。如南昌扣留了蔡廷锴，第十师尚在，这是绝对打大胜仗，那是李济深基干部队完全失败，我们在广东的局面真有办法。此时我们决定退却时，有两种主张：

一、直到海陆丰与农民结合。

二、迅速由小路（不过揭阳河，只距八十里）退至潮州，与革委及第二十五师联合，再退福建，结果从第二主张。但向导语言不通，终于退由揭阳再开往潮州，因马牙渡渡河之困难，行动又迟缓，至揭、潮中途，而潮州已于三十日傍晚被黄绍竑攻陷，不得已联合汕头革委经炮台、关埠、贵琪到流沙，拟仍向海陆丰退却。革委是十月一日由汕头退走的，在未退走之三日前，即九月二十八日，李济深的海军飞鹰、民生两军舰上陆袭击革委，被击退，若无此事革委将不能安全退出汕头也。九月二日革委退至流

沙，各部队于次日始到达，革委召集将领会议，决定敌军追我军势急，我军如退海陆丰实力恐难保存，拟由云落北窜作流寇行，以帮助农民斗争，革委则去掉国民党头衔，分散各省活动，将领中不愿随行者听之。此议虽决，而部队仍由流沙经钟潭向海陆丰道上之云落前进，故命令未得下达，贺龙军刚过钟潭，而叶挺军未过钟潭之时，被普宁方面之敌截为两段，军无战心溃散不少。

革委人员因亦解体，陆续逃往香港。此后我们军队情形如次：

(一) 叶挺军第二十四师在流沙剩有一千余人，由董朗统率经甲子港以赴海陆丰，图与农民结合。贺龙剩有二千余人，亦由云落到海陆丰。

(二) 叶挺军在三河坝之第二十五师，最后在香港报纸登载：十月二日与钱大钧等在三河坝战斗甚激，旋向福建平和、永定退去。

我们在香港，党的决定命令他们两处军队，各就所在地与农民结合，努力实行农村斗争。

这一期政治方面的主张，比南昌时较为彻底，最著者，就是在瑞金决定建立工农政权，在上杭议定没收二百亩以上之土地的二百亩字样取消，就是土地归农民的话。在流沙决定革委去掉国民党的头衔。惟距失败之日太短，未能充分的表现出来。

汕头为帝国主义势力比较雄厚之地，他们的兵舰调在汕头有好几支，于我们到后，水兵登陆，向我们种种威

吓，我们为军事紧急对他们让步，我们委的汕头交涉员——郭沫若也就按照这个意思办理一切。但我们的同志，大半受了这种帝国主义威吓的影响，对汕头到了的工农讨逆军，亦有要他们离开汕头市场之言论，甚至公安局负责同志，于工人有拿商家物品者，立予枪毙。有工人说这是蒋介石的军队一样，这是何等的错误。

汕头市场的保安队，仍是工农军组织的，而工人也努力在汕头造弹厂造弹。

近之如梅县、兴宁、五华、高陂、澄海、潮阳、普宁、揭阳、海陆丰等县，远之如海南、西北江方面的农民暴动，以及潮汕的工人炸弹案，破坏潮汕路等等，都是工农群众联合军队共同努力奋斗之表现。但因消息隔绝，我军运动迟缓，未能协同动作，影响于军事者不甚重大，结果反革命军队不十分顾及工农暴动处所，仍是集中其所有兵力，向革命军队决战，其意在将革命军队打败，以后再来镇压无甚武装之农工暴动是容易事。这是我们的党没有影响在敌人内部的下层关系，反革命如此，最容易收功的。

广东省委组织各路工农讨逆军，东路总指挥是彭湃，其指挥区域是在东江，他是：

以郭瘦真驻三河坝，指挥兴宁、饶平方面农军。

以杨石魂驻揭阳，指挥海陆丰、澄海方面的农军。

他们的主要任务建立各地工农政权并扰乱敌军及肃清反革命派。

我们的革命军曾将剩余枪枝分给一些与农军，半因将

领欲另成军，半因农民囿于乡土观念，恐接收后即他调作战，竟至接收革命军枪枝不多，而革命军剩余的枪枝，在潮州方面对敌，损失在四千枝上下，真是可惜。

我们想以农军补充革命军兵员的计划毫无成绩，自然是时间太短。但是，农民其意重在本乡中寻得土地，愿意从军出征者少。而工农讨逆军募兵组织又不好，以致如此。

工农讨逆军十分涣散，不能望他们协同革命军对敌主力作战，就是扰乱敌军成绩也不甚好。甚至于对地主斗争时，他们的应援不灵，也要军队帮助，如浮阳、普宁、澄海的农民斗争，是派兵去帮助才得胜利。说到军队派到普宁帮助农民争斗的事，我们又有件恨事，就是破城后，农民杀地主，是自然的、应该的，乃去的这个营长，出告示安民，下令禁止，这是何等错误。

这一期的经济情形，除在潮汕筹款比较多，部队减去恐慌以外，其他地方都是困难。军队运动之迟缓，一切设备之没办法（如部队衣被等事），亦受了这种影响，我们都感觉这问题困难。就分工说，自然是财委筹款，政治保卫处捉地主勒款，粮秣管理处征发地主粮秣，总觉得须统一计划与力量，才成立一个战时经济委员会，由各负责同志，共同组织起来，成立数日，即遭失败，成绩无所表现。

四、结 论

在未作结论之前提出一问题：

此次南昌暴动，自然应该有的，究竟是根本上绝对的无胜利之可能，失败是必然的么？不是的。或是根本上有相当胜利之可能，因我们行动上犯了错误，才致于失败的么？是的。以下先说我们根本上的弱点，次说我们行动上的错误以作结论。

1. 我们根本上的弱点

(一) 就时间说，未能暴动于长沙事变，工农群众激昂有力，又逢河南有事，而武汉尚多我们同志武装之时，而暴动于国民党第三派联合成熟，工农及军事力量减削与消沉之时。

(二) 就空间说，不能暴动于工农有力军事要点之两湖，而暴动于工农不甚觉悟，形势不好，军实无源之江西。

(三) 就数量说，凑合仅二万零五百之兵力，而暴动于环敌十万之中，在通常革命军自然较政府军的兵力小，但是群众趋于革命之结合的多，今革命群众之结合亦属少数。

(四) 就质量说，敌军自然内容复杂，战斗力不尽强，而我军内大半非同志领导，而无政治认识的部队，且训练能战的亦不甚多，因此无收指臂效果的可能。

既有以上四个弱点，而与强大之反动力量对战，暴动的胜利，自然不敢说是绝对的，但我们如善应用反革命营垒中的利害冲突，而又施以精敏正确的行动，诚有相当胜利的可能。

2. 我们行动上的错误

(一) 我们的党，无论何时要有精密的组织、威严的权力，才能确实领导一切，而于暴动时尤然。此次暴动的总领导者，是前敌委员会。如谭平山在南昌领导暴动，而前委并无其名。各同志处理紧要事件不完全是前委开会决定的，党的纪律亦甚松懈，系统不明，权力不聚，责任不专，已失掉了领导暴动的重心。

(二) 暴动时因要戴著国民党的帽子，未把我们土地革命的口号彻底的拿出来，农民之未能充分起来一齐奋斗，自有一些旁的情形，而这确为主要的原因。

(三) 作战指挥是要统一，命令是要厉行，谁也知道是必然的，而且是必需的。这次暴动军事上之进行，事实上可以说谁不能指挥谁，完全是友谊的协商进行。有时协商已定，怠惰迟缓而并未按照实行，甚至遗〔贻〕误事机亦不负纪律上责任，这样如何能说作战。

(四) 我们革命是要不断的不妥协的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奋斗的精神，坚决的手段致敌死命，如对蔡廷锴有了断然的处置，保存这一师至汤坑决战，敢断言绝对打大胜仗，立稳了我们在东江的脚跟，李济深的基干部队

可说是完全失败了。乃计不出此，这是我们同志表现了小资产阶级妥协游移误事的大罪过。

(五) 这次估量太差。估量敌人，自然要靠谍报。估量自己，就要靠仔细的认识，切实的工作。此次估量敌人力量，何以太小？是谍报的罪过。此次估量自己农民的力量，何以太大？是我们不认识不切实的罪过。因为我们既将土地口号提错，农民力量当然减少，如农民在争夺土地之时，确能奋斗，但不能就未编练之农民对敌正式作战。南昌暴动时，尚有望未编训之农民，正式作战者，这是何等的不认识哪。此时农民本可以扰乱敌军的，因计划不周，组织不好，联络不确实，而收效甚小，又是工作不切实的罪过。

(六) 财政本应该在剥夺地主上，坚决的精密的计划，与毅然决然的实行，才能够供给需要，卒于旧的普通派款新的剥夺地主勒款两办法之间举棋不定，款项支出影响了军事。

(七) 我们的党平日少有准备阶级的武装，党员军事人材非常缺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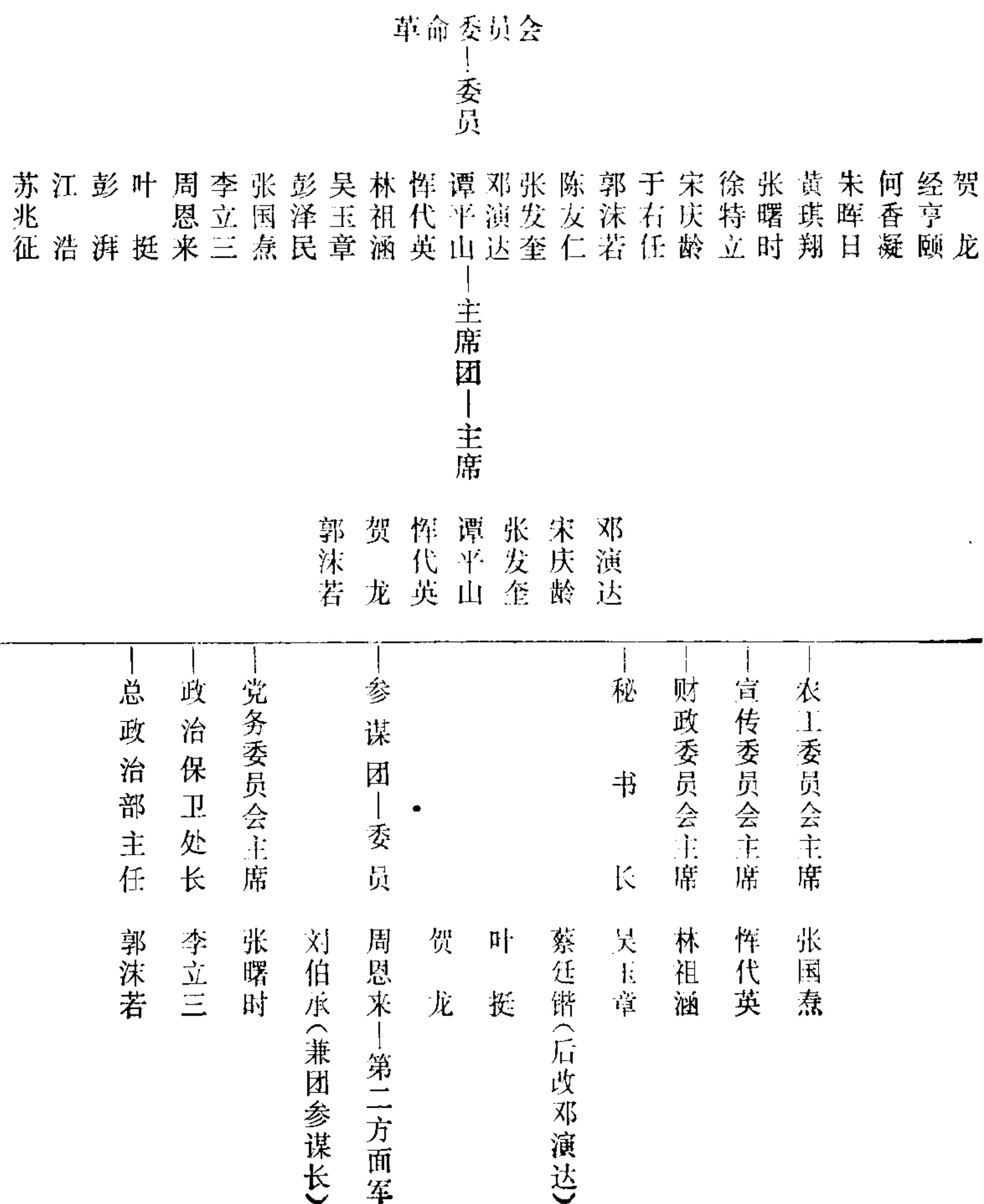
(八) 一切政治工作人员，自然不能在最短时间觉悟农民、组织农民，但到一地宣传，亦须努力为之。又在有组织农民之地，亦没有确实联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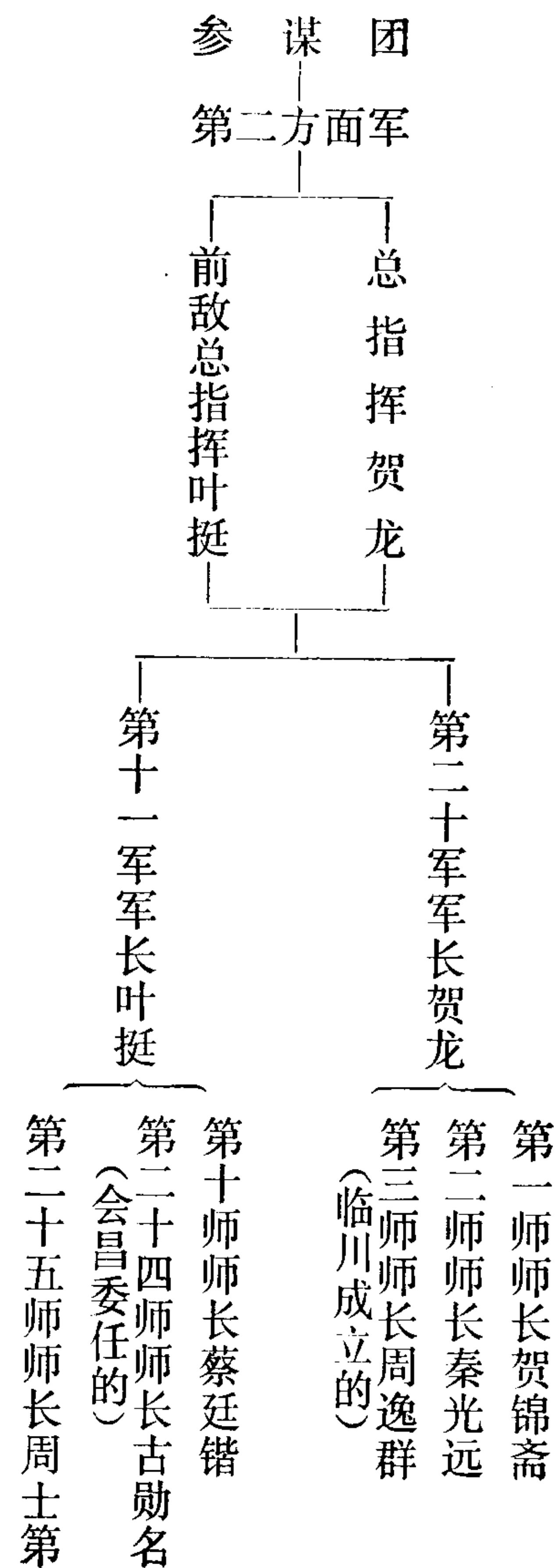
反革命的赣军兵力概要表

隶属将领	南京		武汉		汉口方面		政府方面		江西方面的兵力	
	军	队	政	府	军	队	政	府	军	队
王赖世璜等	叶耀祖等	何应钦等	周凤岐等	张贞等	蓝玉田等	孔庆辉等	朱培德	唐生智	黄琪翔等	由武汉开到九江
王赖世璜普	叶开鑫等	李宗仁等	贺耀祖等	赖世琮等	杨树庄等	谭曙卿等	程潜	何键	缪培南等	敌对南京政府方面
兵	调两岸	约一千人	约三千人	约二千人	约二千人	约一万二千人	约一万五千人	约二万四千人	约一万四千人	向扬子江上移队伍
力	调两岸	调两岸	调两岸	徐州以南	浙江	福建内地	江西	江西	江西	敌对南京政府方面
所在地点	调两岸	调两岸	调两岸	浙江	浙江	福建长汀上杭	吉安万安一带	南昌临川一带	大庾广东雄	向扬子江两岸移动
军事目的	由南京到	由南京到	由南京到	广东东江一带	广东东江一带	广东韶州乐昌一带	其一部已达南昌	由西湖向江西移动	一部已达南昌	敌对南京政府防

参 加 南 昌 暴 动 兵 力 概 要 表

合 计 兵 力						决之势
军 队 名 称	将 领	兵 力 概 数	质 量	同 力 量	同 志	被 各 方 反 革 命 联 合 解 敌
第 二 十 军	贺 龙	约二万零五百人				各方非常恐慌，因有暴动革命空气浓厚，开到南昌，于是南昌指导其自动的由九江发奎态度游移，我们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
第 十 一 军	蔡廷锴	五百人				瑞金加入本党
第 二 十 五 师	周士第	直属的二千				贺龙于攻克会昌后在其群同志，成为第三师。与其政治部主任周逸
第 四 军	叶 挺	远的二千人				其直属的一千五百人实，暴动后至临川交
第 二 十 四 师	叶 挺	第二师秦光				挥，并为之谋补充军
第十一军	周士第	斋的三千人	弱			高级军官一个也不是第二十军很少同志，
		第一师贺锦	作战力较			暴动前我党同志曾许的。该军受各方压迫，
						他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
						暴动前我党同志曾许高级军官一个也不是第二十军很少同志，
						被扣留
						团长、参谋长者，后
						叛。其师中同志有为不果，致后有进贤之
						时有扣留他之提议，
						摇动，故于南昌暴动
						蔡廷锴非同志，意志
						五两团
						指挥的是第七十三、
						未来，周士第同志所
						同该师之第七十四团
						原二十五师长李汉魏
						交非同志古助名
						战后，因无军事人材
						叶挺为同志，于会昌
						说 明





附：由南昌到广

期									
	长汀县	会昌县	瑞金县	洛口镇	距瑞金八〇里	九月九日	九月五日	九月二日	先头再由瑞金向长汀开拔，故于九月五日始由会昌转到瑞金，七日第二十军于黄绍竑军由洛口来攻会昌击退之
道里	临川县	宜黄县	广昌县	宁都县	石城县	壬田市	瑞金县	洛口镇	距瑞金一一〇里
日期	距南昌一九〇里	距宜黄一九〇里	距广昌一二〇里	距广昌一五〇里	距宁都、石城均一四〇里	距壬田市三〇里	距瑞金一一〇里	洛口六〇里	距瑞金九〇里
部队	第十一军	第二十军	第十一军于八月二十二日到达	第二十军于八月二十二日到达	八月二十六日	八月二十六日	八月二十八日	八月三十日	八月三十一日
第十一军 第二十军	八月七日	八月八日	八月十二日	八月十八日	八月二十六日	八月二十五日	八月二十六日	九月九日	九月五日
记要	为右侧卫，取道丰城，经崇仁至宜黄会合。选取道进贤叛变，第二十军为右纵队，而其贺师选平行路线，第十一军为右纵队，而其蔡师则	于广昌后取道石城以到壬田市。选取道宁都以到壬田市。第二十军为左纵队，故选平行路线，第十一军为右纵队，故于广昌后	瑞金县，第十一军继续其后。	第十二军，未照预定派兵，被击退，于第十一军，由洛口攻钱大钧之主力，克会昌，则由瑞金正道攻会昌正面，未取道。	军克会昌后，始有其第二，第三两师到会昌。	第十一军，由瑞金取道西江市，攻雩都、会昌。	第十二军，由洛口攻钱大钧之主力，克会昌。	第十一军，由黄绍竑军由洛口来攻会昌击退之	先头再由瑞金向长汀开拔，故于九月五日始由会昌转到瑞金，七日第二十军于黄绍竑军由洛口来攻会昌击退之

东军事简要表

第二期										附记		
上杭县	大埔县	三河坝	陷 隘	潮安县	汕头县	揭阳县	白 石	汤 坑	关 埠	流 沙		
距长汀一四〇里	距上杭一九〇里	距大埔四〇里	距三河坝一〇〇里	距潮安八〇里	距潮安一二〇里	距潮安七〇里	距揭阳三〇里	距白石三〇里	距关埠九〇里	十月三日	十月三日	
九月十五日 （欠）	九月十九日 （欠）	九月二十日 （欠）	九月二十二日	九月二十三日	九月二十三日	九月二十六日 （欠第三师）	九月二十八日 （欠第三师）	九月二十九日 （欠第三师）	九月三十日 （欠第三师）	十月一日	十月一日	
九月十二日	九月十八日	九月十九日	九月二十二日	九月二十三日	却，遂克潮安。 小有战事，即由潮安分经陷隘、揭阳向汤坑退。 潮汕王俊的兵团，与我军在三河坝陷隘之间。 窝在后，于九月二十二日，始到三河坝停止。 行动迟缓异常，而第十一军之第一十五师尤远。 水陆并行，惟以安置负伤官兵及筹款困难关系，远。	未集中。第二十军第二师尚未完全到达。						

1. 其后第二十军第十一军之两部约有三千人退入海陆丰。
2. 其后第二十军第十一军之两部约有三千人退入海陆丰。

关于随军作战情况的报告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八日)

陈 恭

恭此次随军作战，所有经历情形，堪可报告者甚多，而对于整个军事运动之失败，亦有若干可供研究之意见，用特综合逐一报告如次。

甲、作战经过情形

一、汤坑之役：九月二十七日，总指挥部在揭阳接到汤坑牒报，谓敌人王俊、黄绍竑部实力约千余人，已集中汤坑，准备向揭阳前进攻击我军。当晚总指挥即决计以全力用很迅速的手段 扑灭该敌，故次晨即将驻揭阳之十一军二十四师及二十军之第一师扫数调向汤坑方面进发，第二师亦促令赶速由潮州开来，不料行至距汤坑约三十里之地，即发现敌人先头部队，遂与接触，初被我军节节击退，并获少数俘虏及枪械，是晚双方在距汤坑约二十里之地相对警戒，备极森严。次晨拂晓又开始战斗，我方仍有相当进展，至上午十时，敌军仍扼守高山，用极猛烈之火力阻我军前进，我军尤勇猛与之搏斗，大部兵力已至山腰，时值由揭阳开来之二十军之第二师四五两团赶到，顿增生力，敌复稍退，我军于是得完全占领前面高山。不料当我军占领该高山后，敌军又进至另一高山相与抗衡，自正午十二时起，至晚九时止我军虽以极猛烈之火力向之扫射，该敌犹顽强不肯退，彼此冲锋各十数次，亦均坚守固有阵地，不为变

动。此时我军始知敌人之兵力较多，而火器亦极精锐，不易击溃，遂决计举行夜袭，令二十四师之七十一、二两团兵卒，齐上刺刀，乘间企图冲入敌阵，一面用一、二两师兵力在高山用极密烈之火力为之掩护，袭击部队，以火焰为号，以图围缴敌械；不料冲去二小时，不特未见火焰，且见我方冲去官兵纷纷逃回，问之，则谓敌军已有准备，当我军冲去时，彼甚为镇静，将我冲去之兵卒，围住缴械，以此不愿缴械之兵士，既冲锋进，复冲锋出，一往一返，损失非常巨大。此时，能集合再行前进之兵力，只有二师之第四团，为数已有限矣。战至此，总指挥见我方一则兵力损失过多，二则全军弹药将罄，已无法能再与支持，于是下令引退。待退却令下，各师点查人数，已减损一半。遂由第一师担任掩护，全部向揭阳退却。

二、乌石之役：九月二十九日我军自汤坑败退而后，知揭阳不可守，遂决占据潮州，待部队将近潮州时，忽又改变计划向海陆丰方面前进，企图速取惠州，以与张黄部队相接近。故至十月一日，我军大队，复行在距揭阳约四十里之地的炮台渡河，待渡河完毕，即已天晚，故是日仅在距炮台约十五里地宿营。次日二号行六十里，在贵屿宿营，竟日无事。三号复由贵屿出发，第一师为前卫，第二师次之，总指挥部又次之，十一军二十四师为后卫。是日已得牒报知普宁方面已有敌人企图包围我军，故命令为上午三时出发，而第一师部队至六时尚未开拔完毕，以致是日上半天行军路线，非常拥挤，费时半日，亦不过行二十余里。至午后三时，当我二十军部队已过乌石，总指挥部及二十四师尚在乌石时，在乌石前方山地，偶尔发现敌人，向我途中部队射击。时总指挥以二十军部队均已通过，只有二十四师及总指挥部为敌兵隔断，殊为不利，遂决令二十四师七十团、七十一团、七十二团分前左右三向占领阵地，掩护总指挥部通过。不料甫将兵力分配，而敌人枪声大作，途中零碎

部队及大小行李见势均纷纷退走，一时途中人马，极为混杂，统率既不一贯，号令自难执行。总指挥虽猛力阻止退走，终于无法使其服从命令，于是只好集合所有弁兵，扼守要路，其余闲杂人等，任其逃走。惟有枪兵士尚令其与弁兵会合，以图作万一之抵抗。如此，只退走十余里，即已停止，点查人数，不过二百之谱。而二十四师部队，因向左方退去，便无法指挥灵活，运用自如矣。晚十时，总指挥偕所属重要人员，始行逃走。

（乙）失败之原因可分远因近因两种

（一）远因：

一、“八一”革命后本党政策的错误：“八一”革命后，我们的军事和政治都陷于孤立，除我们自身而外，几无人不是我们的敌人，无处不有我们敌人的势力。此时，我们的党自信太强了，耑赖一部分军事势力而停止一切政治活动。于是我们党的政策，更显其笨拙了！一切左派国民党，都受我们的骄横而离开我们，不能与之合作，即不能得其助力；不能得其助力，即更使其与敌人团结来对付我们。张发奎以至黄琪翔，即其一例。

二、“八一”革命后军事计划的错误：不应先取潮汕，更不应于敌之主力未被击破以前而使全部队伍，在潮汕揭阳等处停顿，与敌以调遣集中的时机。

（二）近因：

一、关于战术方面的：

（1）侦察不确实：汤坑之役，我方侦察敌人不过千数百人，而不悉其主力已尽在于此。故初与交绥，即有轻敌之弊，待后见敌兵众多而顽强，士气已馁大半。

(2) 不能坚忍持久：在汤坑退却之先，敌我相持已两昼夜，且对方节节夺敌十数阵地，可称顺利。不期当已占领最后那最高之阵地后，彼此相持二十小时，见敌不退，我方即先敌退却，殊为失利，因当时环境，敌我均同，困苦是一样困苦，而我方不能坚忍。且最后发现当我方袭击后，敌人已有退却模样，更足以证明我方未能坚忍持久之过失匪小。

(3) 踟躇太久：当我军由汤坑退却后，即准备集中揭阳，以图再战，及抵揭阳后，忽又改变计划，将部队开赴潮州，枉费周折，已败敌一筹；加之由揭阳渡河，费时太久，敌之追击已接踵至；故当我军尚未抵潮州时，敌即大队至揭阳，次日计划又改，所有部队，再由潮州折回，由揭阳附近的四十里之地点炮台地方渡河，此时虽用小火轮载渡，而费时将近一日，揭阳之敌，此时已俱悉我军狼狈退却之路线矣。似此踌躇约有一日半，兵力亦极疲惫，实致败之重要原因。

(4) 过于轻敌：我军经再三踌躇之后，决即由揭阳经普宁而入海陆丰，大路既有敌兵占据，我军只能在离揭阳约四五十里之乡路经过，途中因道路过小而起拥挤，固不待言。而我高级指挥官之过于轻敌，依然如故。在三号那天，我军先头部队，一若从前之旅次行军然，不特无作战准备，且不知沿途搜索前进，以致中途发现敌人时，我后续部队尚在不知不觉中，士气惊恐，不言可知。

二、关于战斗方面：

(5) 因官兵心理，多不愿牺牲，故冲锋陷阵，不甚勇敢。

(6) 所有器械，连日使用，未能善为保管，以致有枪而不能用者，所在多有，机关枪更不能用。

(7) 弹药短少，无法补充。

以上都系关于战斗方面不利之重要原因。

三、其他：

(1) 死伤太大：汤坑之役，我军死伤将过千人，所有各级军官，损伤大半，一时无法补充，只得将下级挨次升补，多不称任。

(2) 救护太坏：汤坑战事尚在相持之际，我军死伤官兵，尚得抬回救护；及至败退，则所有重伤官兵，均遗弃道旁，无法搬运。因此一般官兵，均有触心之感，于是而令其作战，均不愿勇敢牺牲无疑。

凡上所述，均系恭个人据实直书，亦我军必败之具体事实，无法挽救于万一者也。当此全国革命潮流下降，而又遭此次本党军事运动之失败，整个的中国革命前途，自增加极大之困难。际此，关于今后革命进行之策略，更有深切研究之必要。恭对此意见特多，因遭此次事变后，备受肉体上之痛苦，因之精神至今尚未恢复，不能即行录出，待迟数日，或可将个人鄙见逐一提出，借供吾党负责诸同志决定今后大计时之参考。

关于南昌暴动中二十军的斗争情况报告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赵 轶

这个报告多半说的是二十军的事，四、十一军因为我不在里边并且没功夫打听，因此没法报告，就是二十军的一切，我也是只就大的方面说说，十分详细情形，仍不清楚，现在我就把二十军的一切及离现在十五日以前的一切陈列于后：

(一)二十军的内部

二十军共是三个师，其中一、二两师的军官很多反动的。他们最不满意的就是第三师，因为第三师是共产党员在里边当师长（周逸群），内里的军官也多半是共产党分子，兵士也占四分之一，并且贺军长时常是夸奖第三师，抵触他们（一、二两师的反共空气），因此更激动他们的反动，但是处在贺龙那种权威之下，他们是敢怒而不敢言的。至于贺军长呢？他是个很鲁莽的武人，他常常在开军官会议的时候，就骂国民党，并且说：“今后的革命又是一个政党来领导，靠咱那个国民党是没有希望的了……”。同时他还说那些军官“你们不要反对什么共产党，共产党是革命的，只要你愿意加入，自然有人会来介绍你，如果你们要怀疑这个，排斥那个，说这个是共产党，那个是什么，我若是见了是不能随便饶恕的。如果你们要问

军长是什么？那我想不用我说你们还不知道吗？”（意思就是说自己是共产党）。他这次在上杭将第三师教导团第三队的学生提前毕业（因为第三队的学生是他的老同事），但因为第三队的学生反对共产党最激烈，同时又有小团体的组织，因此他就在毕业的那天，他将第三队的学生凡是反动者一概看守起来，仅三、四名算毕了业，此外他在行动上也是非常之浪漫不必说了。再次就说到二十军的兵士了，二十军的兵士，在一、二两师的差不多和他们的军官是一样讨厌第三师，笑话第三师的兵不能打仗，讥讽教导团的学生是吃不了苦，老作后卫（行军时第三师常作后卫），骄傲异常。至于第三师究竟怎样呢？第三师共是两团（教导团、第六团），教导团的学生除第三队外，都是各地被压迫的青年，他们因为过惯了学生生活，自然免不了有浪漫的色彩，但是这里边也有种种原因，使他们不得不延长他们的此种浪漫生活，就是太少训练（简直就没有受训练），所以在军纪上最初确实有不好的现象，但到后来是渐渐地好的多了。第六团是新兵，训练更比教导团少，同时又无知识，所以没有什么可言，但军纪也不算怎样坏。

（二）行军时的情形

在八月五号奉革命委员会及军部的命令出发，由南昌至抚州，这一段真是糟糕极了。军队因为多时不开差，一经动身，自然在军纪上、精神上都显出一种堕落的现象。同时第三师的新兵又没有尝过这种滋味，受不起这种痛苦，于是丢毡子丢东西简直是多到极点，甚至因为疲倦的关系，把子弹都丢弃了许多。同时又因为纸票的关系，老百姓都不开门，因此沿途连一个人都看不到，唉！在这一段中真是糟到极点了，有许多不肖的官长（司务长副官之类）及学

生，腹内饥饿的时候即将老百姓的瓜果鸡鸭拿来充饥，因此更惹起老百姓的惶恐与讨厌，所以来每到一个地方，简直是十室十空了。唉！唉！……这种现象过了两、三天后，贺军长异常愤怒，于是枪毙了一个司务长（捉鸡吃），并宣布如有发现无故鸣枪及乱入民室者，就地枪决，于是军纪渐渐的好了，并且后来又发了几道现洋，行军中间才不感到什么困难，而军纪也容易整顿了。

(三)作战时的情形

此次由南昌出发一路在战略上是避免作战，樟树虽然敌人准备了三千，然而我们并不去招扰他，一直到瑞金的壬田，第一师才和钱大钧的部队开始接触，但一战即破，第三团团长死于斯役。敌人在壬田败后，即退归会昌准备与我军作最后的死战，筑了很坚固的战壕，五团之众布成阵势，在这一战，十一军攻侧面（会昌西门），二十军第三师攻正面，从上午七时起开始接触，直至下午五时战事才算结束。是役也，第六团损失殆尽，全数退却，幸教导团及时赶到，激战六小时即行冲锋，敌见来势凶猛始退却。但教导团在此次战争死伤的非常之多（团长带伤，总队长带伤，总队副及队长阵亡及学生等死亡……）。会昌战后敌人恐我军直入广东，于是大调队伍于赣州、韶关一带阻我前进，孰料我们变更计划，于九月五日由会昌返瑞金，向福建进发，经汀州、上杭、峰市直至三河坝始发现敌之部队（潮州警备司令何辑五的）。但当时因为我们打了好多次的胜仗，敌人实在是吓破胆了，并且他这一部分是没有受过训练的，所以我们一到三河坝敌人即仓皇遁走，沿途遗失枪械子弹军用品等无数。直至大麻子村才又小有接触，但敌终是不敢作战。第二日（九月二十九——记不清楚）又在距潮州约八十里之地又两下交锋，激战三

小时，敌又败退。从此之后，敌人不敢作战，且潮州不易保守，于是敌人放弃潮州，四散逃遁（何辑五逃上海），我们于九月三十日晚长驱直入潮州关。汕头因为靠近海边，潮州一失汕头即不能停足，所以当天黑夜，汕头亦为我军所据。潮汕克复后，革命委员会参谋团等即全部同驻汕头，一时国民政府也将成立，共产主义青年团、共产党第△区分部等等相继出现。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捉拿土豪劣绅等等，闹的轰轰烈烈。广州派来兵舰，迭次上岸来冲，无奈限于气弱，终归失败。当此时间，揭阳、海陆丰等处农民暴动甚凶，同时农军与民团及敌军已在激烈对抗之中，革命委员会恐农军单独支持不易致胜，同时又在战略上乘敌未能大部集中，一鼓荡平，于是所有军队除二十军第三师以外，全数开拔前方。后方汕头方面，仅留三师（周逸群师）的第六团（这一团在现在实际上只一营，因前次会昌作战损失太大，至今未补充起来），潮州方面仅留三师的教导团，教导团之所以留潮州者，是因为教导团是知识分子，且多系在各地工作被压迫而来的，同时官生多系共产党，并且它的性质就是教育机关，因此革命委员会决定教导团在潮州训练两三个月，即行毕业，马上扩充新兵，即以此部分作下级干部。教导团虽然奉命驻扎潮州，实际比在前方作战还要忙碌，每天起来不是派这一总队出外打民团去了，便是派那一总队捉土豪劣绅去了。此外地方警备治安及看守囚犯等等，简直是勤务多到极点。当此忙乱之际，在前方战事倒是十分顺利，揭阳、海陆丰等地尽为我所得（在这里农军出力很大）。无奈后方太空虚，即以潮州而论，仅一教导团。教导团自会昌作战后，牺牲损失亦不少，到现在并未补充，同时病号占全数三分之一以上，实际说起来仅六百人的样子，尚能作战，但又是担任剿匪等事不能居城，城内所留者仅一总队，除病假而外只一百余人。这里一个连哨，那里一个军士哨，以

及重要机关的卫兵，都归这一百多人担任，你想哪里顾得来呢？当四号的时候，忽有敌人约三团之众，袭击潮州（后方仍有继续部队），而潮州只教导团第三总队，于是夜间即行布置，天明九时余，第一、二总队亦相继赶到，直至十二时余，敌之部队全数到齐，向我施行攻击，于是两下奋战，历四小时之久，敌之部队较我军人数大过六倍，所以他们除在前线分配外，尚余一团余作预备队，而我军六百余，来应付他两千余人，自然是很难照应。加上攻守心理关系，以及我们的枪多数损坏，子弹许多打不响或告竭（自出发至现在打过无数次仗，子弹并未补充）和敌人的众多等等，使此次战争受了很大影响，果然敌人一个大包围，民团乘势加入，一时间四面八方尽属敌人，我军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始冲出一条出路，于是全线不得不速行退却。在这个退却中，牺牲较在战场上要加大好几倍。象我们这军队尤其是教导团，没有受到训练，过去的历次胜仗越打越有劲，此次一个败仗，在他们非常扫兴，于是无论如何官长是指挥收拾不住的。所以你跑我跑挤在一堆，容敌人一个好射击机会，因此受伤毙命者异常之多。当教导团未行退却时，敌人已一部进了潮州城，说起来也笑话，敌人已经进了第三师师部了，而周师长尚和一些工商等代表讨论维持市面的事情，敌人已快登堂入室他们才察觉，仓卒召集特务连支持，已无济于事。只得随带护弁向外脱逃，潮州由此遂为敌所有。同时革命委员会参谋团等亦放弃汕头，汕头亦就为敌所据矣。

总括起来，我们现在虽然在军事上不算完全失败，却也没有什么胜利可言。但是所以得到如此结果之原因，据我看有下列几种：

（一）一、二师军官太坏，有嫉忌心，无打仗心；（二）学生士兵（二十军方面）未受训练，不谙军事；（三）高级军官不懂军事（如周逸群）；（四）无政治工作（沿途未组织宣传队，后来教导团有了，然

亦仅贴标语而已）；（五）枪坏了没法收拾，子弹完了不能补充；（六）敌人多过本军数倍；（七）长时作战不能一刻休养，因此攻击精神不能恢复。

凡此种种，我认为是此次受损失的最大原因。

（四）我来的原因及请求

我是在二十军教导团充当队长，此次在潮州作战，迨大势不支，指挥官发下退却命令后，即随队一齐下来，并且我第八队还掩护团部退却，团部退后，我八队亦随住背进。孰料我们团附（谢独开，同学），体质软弱，奔跑不动，以致落后，他惶甚，我乃命一学生将他背在身上前进。学生经长时间战争，背他走了数十步，无力放下，他于是没法，就命我给他断后，我在此时本不能和队伍分开，但又不能不服从他的命令，一直等他上船渡河，敌人已距我仅十余步，我一面抵抗一面进城，距料城已为敌所有，拚命奋斗，才杀出城外，而队伍走到什么地方，则无从知道。当出城之际，适逢师长周逸群亦刚由城内杀出，于是走到一堆，将他的随行特务连零星兵士和一路退下来的兵士，在城外十数里许，共收集了有两排之众，由师长指定第六团（记不清是否六团）一个营长充当连长，我当排长，还有教导团第四队队附及原有一排长亦充当排长，是日黄昏即开始前进，但没有目的地（因四周都是敌人），我当时充当尖兵长，师长给我一个任务，是今晚要渡江东进，尖兵长速到前面找船，我奉到任务即开始进行，孰料此时尖兵来了，本队亦来了二分之一，而本队那二分之一及连长师长等统统没来，却也奇怪极了，我连往往报告了几次，不见师长。唉！这才使我没办法，于是四面寻找，终于没见，只好不顾一切的向汕头大道前进。一路与民团接

触两三次，尽皆驱散，天亮时许多兵士（原俘虏过来的）开小差跑了几个（仍回他们的原部队了）。到汕头即派便衣侦探向前侦察。哼！满街都是敌人，什么革命委员会、共产主义青年团等招牌打得稀烂，并焚烧了几次房屋。我见到如此情状，乃住到一个打渔的小船上，连兵士共六七人。广东话咱又不会说，也听不懂，民团居然侦察到了，硬要使我将枪卖给他，我无论如何支应，没有卖去，但这样那里能行呢？吃没吃的，还惹人注意，同时找队伍亦找不到，没法只得将枪掩藏起来，几个人各找出路去了。我出来之后，就到汕头，许多次有人问我“你当兵多少时候了……”？弄得我没有办法，什么音信也听不到。适逢向上海的船要开，糊里糊涂就上去了，旋又被赶下，后来得了福音堂的保送（保送了许多），才到了上海。在船上曾经遇见周逸群，但他一点办法也想不出，钱也没有一个，我恰好有几张湘赣桂的中央券，于是十块换一块的换了点路费跑到此地了，这就是我来的原因。我的请求是什么呢？就是此次失了联络之后简直是受尽了想不到的奇苦，但是现在天气逐渐的寒了，而我仍然穿了一套单衣服，冻得嗦嗦嗦的打战，每天因为这种原故要按时的发一次摆了（发冷发烧），两筒清水鼻涕时常往下流，饭也吃不上，也没有钱住旅店，工作也找不到，人地两皆生，唉！简直是不知如何是好！所以请兄无论如何要设法给我解决两个问题。

（一）衣食住问题；（二）工作问题。

这两种问题千万要马上解决，我是在外面冻饿等候回音咧！

（我是没有住址，通信时就写“蒲春笃庆栈交武绳祖转我”可也）

从广东回来的报告

——“八一”南昌起义后行广东的经过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焦 其 恺

继承中国革命正统，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团结真正革命同志，高揭土地革命，废除苛捐杂税，以工农为主力，以小资产阶级为同盟，标出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中国国民党中央革命委员会，于南京倡乱，武汉叛变，新旧军阀投降勾结帝国主义及国内一切反动势力，造成了极端的、广大而普遍的白色恐怖的层层包围中，她（革会）随领导着几部分真正革命武装势力，团结数万真正革命同志，八月一日在南昌起义，解散了反革命赣省政府及其所属机关以及反革命的拥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民众（？）团体，解决朱培德、程潜所属部队约三团余人。因此，招整个的反革命尤其是反革命军队的嫉妒，经济封锁，交通断绝，给养全无，处到四面楚歌的革命委员会才决定由南昌出临川而广昌而瑞金而寻邬（入粤集中地点）后，先据潮汕稍事休养再图广州，建立革命的新根据地。当时组织了第二方面军直辖有第四军之二十五师（缺两营），第十一军之十师与二十四师，第二十军全部，不意进抵抚州，第十师在进贤不进，实行叛变，降了南京。各革命委员后在临川正式就职，此时所辖总计五师（共十一团），因组织成分及军队训练颇好，尤以二十四、五师为最，将士异常团结，大家都是知道前进是生路，后退是死路，时时准备与敌人作殊死战，建立革命新根据地的。以下略

将入粤行军情况、战斗情况、失败原因以及现在保存势力分述之：

行军情况

从南昌出发是八月四、五号，当时天气正是炎热，出发匆忙，抛弃轻重行李甚多，并因三军潜匿军队于我军出发不过两小时即占据南昌，且出城截留落伍兵士枪枝。当时该敌人少，慑于我军，不敢追击。然我军因为由南昌到临川一路，较形纷乱，且因士兵负了重大行李（子弹四百发），兵士任意放枪及乱打民鸡者到处皆是，以二十军为最。三日内，部队有几团屡不能得食，给养全无，天气浩热，得急症者甚多，无药医治（各卫生队组织不善之故），死者甚伙，到临川有杨如轩部一师余人，已先两日分走各山内躲避。从临川出发后山路崎岖，给养尤难，不得休养与休息，以至到瑞金将至一月。这个过程，沿途有土匪时出截留辎重行李及落伍兵士枪枝，并有赖世璜部队在前阻挡，虽然该土匪及赖军闻我军大队至，即逃窜无踪，但我军亦不能不严加警戒，以是疲劳兵力最多。且土匪及赖军退出一地即大施抢劫，并作许多反动宣传，我军赶到，民众多有逃跑者。如至宜黄时，全县几无一个民众。后来详细调查全城内有老孺八九人。至新丰（赣南大镇）亦如宜黄，街上只摆有数十缸红胶糖（该地出产），因无米食，众皆盛碗胶糖充饥，并有以桐油炒干饭，过后多呕吐。且天气有时热甚，有时冷甚，变化不定。总之，每天总有每天新生活新环境过的。这样行军，日不得休，夜不得寝，饥不得食，寒不得遮，物不得拿（无仗），若以平常军队，决不能维持，只有鸟散。但我军有政治理想，有战争目标，上下融洽，军心如一，虽在如此困难地步，即极苦之兵士亦无怨言，只知向前是生路，以建设革命新根据地为目的，尤以下级军官多我校同志，团结

更坚固。

战斗经过

我军一路消息为敌人封锁，至广昌后，始知广东李济琛已以钱大钧、黄绍竑两部共十五团人，移动至雩都、会昌、瑞金阻止我军攻入广东，并传闻福建由汀州出三团人，潮汕由寻邬出兵二团，并张发奎降李，追赶我军，已过临川等语。是时我军已知敌有一师在宁都布防（赖部）、一师在瑞金布防（钱部），我军以第十一军（二十四、五两师）为右翼军驱逐宁都之敌，二十军为左翼军驱逐瑞金之敌。宁都赖部闻我军至，入山或乱逃鸟散，十一军随与二十军又取一路行进，隔日随与敌正式接触，自后战事日多，兹分述于下：

(1) 壬田(不到瑞金)之役：约在瑞金城前方三十里之地壬田，我二十军第一师即×月×日上午十时与敌之新编第一师王文翰接触，敌据险（在高地上且与我攻击得一不能徒涉之河），且敌以逸待劳（先我二日到金城），并于险要处做工事。我军虽在左翼上于下午三时许，以二团兵力将敌击破，但敌之左翼即我之右翼之战事，反觉困难，故本日不能击破敌人。但至下午三时后，不能见敌之大炮轰轰声了，可以判断敌已无力再与我军抵抗。四时后，我第二师五团先行增加，四团更在右翼上枕戈待命出击，斯时因已伤我团长一、营长三，下级军官尤其多，兵士受伤者亦已数百计。当晚战事随告休止。明日拂晓，我军以第四团横扫敌之右翼，敌即溃败，斯役俘敌官兵数百，获枪数百，机枪六支，于下午追击敌人至瑞金南门十余里宝塔高地一带，敌向会昌大道溃退。此后，打破敌阻止我入闽大道，我军大获全胜，遂在瑞金暂时从事休息。

(2)会昌之役：江西一路信息封锁，我军到广昌后，始知敌

第八路右翼军、中央军布防情形，并传闻各种信息。又将在南昌决定由寻邬直进潮汕计划改为经闽入粤，以为可以：①减轻兵力疲劳；②不受敌之侧击；③给养容易（寻邬一道给养困难至极）。经壬田战后，我军将敌之先头精锐部队击破，始又决定追击，以长汀为后方，以瑞金为大本营策应各方。故以第三师之教导团、六团及二师之五团为正面佯攻部队，而以二十四、五两师包抄侧击，最主要消灭敌军侧击部队，三师经武阳围谢坊佯攻会昌之敌，二十四、五师至会昌西约四十里洛口截断敌与雩都黄绍竑中央军连络线，从侧面包抄会昌之敌而消灭之。敌在会昌者，为钱大钧部——第二十师、十八师、新编一师，合计十团之众。是日战时我正面佯攻部队未与右翼包抄部队取得连络，指挥官（逸群）操之过急，即向敌猛攻。敌之二十师向会昌退却，情状非常狼狈，全体有瓦解形势。三师追击十余里，至离会城二三里之处，敌又增加三团之众，猛烈反攻。三师六团为新成部队未多训练，教导团多学生，五团在壬田亦有损失，不敌，令敌将六团完全击破，战斗兵只剩百余名，后败三十多里，教导团稍退即占右翼高山，与敌抵抗，五团在左翼亦退二十里。此个失败是没有遵守佯攻之计划。然此时敌亦未追击第三师。乃因我右方包抄部队是日早赶到洛口，即留少数部队（约一营余人）向雩都警戒，以全力对会昌之敌，由侧方猛力攻击，战事异常激烈。敌占地势异常险要，但我军勇猛接连冲锋，经历大山二十余个，为历史上罕见猛烈战事。我军虽有损失（如七十二团只余战斗兵四百多人），但至晚将敌完全击溃，俘敌二千余人，枪一千余支，机枪多挺，残敌向寻邬大道溃退。钱大钧几被我军生擒，盖我军已进东门，该逆始由南门外伪总指挥部狼狈逃窜。此役关系革命前途至为重大，为我军能否直入粤省，或经闽入粤的一个关键。终赖善战勇敢之二十四、五两师收最后胜利。是日晚，在会昌宿营。明日拂晓，

敌中央军全部由雩都赶到会昌东门外附近，并占领东方高山一带，截断我会昌与瑞金之连络。我二十军之四、五、六、教导各团已完全先行撤回瑞金，只有二十四、五两师，是时将士用命，猛烈冲锋，夺回东门外一带高山，将敌中央军又击退，完全入于安全境地。惜斯时早已决定经闽入粤，对敌不施追击，今敌一路安全退寻邬、武平一带（钱部），一部安全退雩都（黄部），皆能整顿，以为我军后患。

（3）汤坑之役：会昌战事胜利后，我军声威大振，远近敌人望之胆怯，东江农民纷起响应，占据县城的有海陆丰、五华、兴宁各县。潮汕何辑五不能与农军抗，日畏我军到来。待我军到汀州后，给养较充，消息灵通，随经上杭入大埔，下三河坝、高陂、留隍，直入潮汕。入粤一路虽在三河、高陂、留隍小有接触，然敌皆闻风逃窜，至留隍敌四团之众——王俊部补充一、二、三团及第一补充团，皆退汤坑。惜我军不跟踪追击，盖敌由三河退至此，兵士已不能走动了，若追，定可扑灭之，敌得安全退却至汤坑集中。我军既下潮汕，知此两处绝不能守，随以二十军之一、二两师（缺一团）及二十四师，以各个击破之战略，向揭阳大道出发，攻击敌之东路军——陈济棠之十一师，薛岳新编二师及王俊四团，抵揭阳西二十里分水镇与敌先头部队接触，追敌十几里至汤坑，敌依险死力抵抗，并陆续增兵。我军连冲大山数个，与敌相持三昼夜。后敌占一高山，极为险恶，我军阵地，无由得达该山。敌此时可说已被我军打败，不过以此山准备做退却掩护阵地。但此时（第三日）潮汕后方已有变，斯晚我军以二团夜袭，因敌防守极险并凭河抵抗，未得效果。未到天晓，各部皆得到退却命令（向揭阳大道）。此时敌已退却了二团人，不过我军因潮汕危急，主将皆先退却。敌军见我军退得甚快，复又集合，陆续反攻，又成追击我军情况。我军因将士伤亡甚重，兵力已疲劳至极，很匆忙地狼狈退却，损失甚大。至次日上

午十时许赶到离潮州三十里之处，又知潮州失守，改道集中炮台。总之，汤坑是打的胜仗，回头徒劳兵力，多转两三日路程。战略上失败也。

(4)云落流沙之役：汤坑败后，绕路炮台庵埠，第三日行军至流沙附近，前左右三面皆为高山，汤坑作战第十一师又复早到，埋伏前左右高山一带，待至下午五时我二十军之一、二、三、四、五各团皆通过了。大行李辎重队将至敌有效射击地，敌始开枪攻击，我行李辎重队一时纷乱至极，各民伕皆弃担向后拥挤乱跑，不可收容。后方之二十四师不明真象，又见四面发现敌人，乱逃的伕子收容不住，军队又散不开，敌从高地四面冲锋而来，我军在此重重包围之中，各团营连多失联络，给敌一良机。战至晚，我军被敌缴械约一团余人，贺总指挥、叶军长、革命委员等带领千余杂兵由后方大道冲出。此役二十四师消灭殆尽，被截断于流沙前方之二十军，走至流沙前方约六七里高地一带，其后卫，即听得最后方有枪声，然以为无大敌人，待敌将与二十四师连络道路截断，一点消息又得不着，迟疑不去救应，至晚始派一团搜索前进。此役若二十军早来救应，绝不能失败、损失至如是之大。于是等到明早，又进击二十军，我军随令敌各个击破。

(5)三河坝与潮州之役：三河坝在赣江右岸，其左岸为东文部，东文部北有一较赣江略小之江，形势甚为险要。因我军由闽到三河时，已知敌中央军赶到梅县，右翼军集中松口，我军随以二十五师及第九军(约一营)向该敌警戒，至我军大部开去潮汕，并与汤坑之敌正式接触，敌以大部分中央军进袭潮汕，我军因众寡不敌(守潮者为教团，守汕者为六团防备海军)自然失败，损失大甚，所有空枪约五千枝全被敌人夺去。一面影响汤坑作战军队，一面更影响了三河坝二十五师，及至二十五与敌接触，已成孤军奋斗。与敌战约

二昼夜，战事尚堪支持，后敌以一师部队占据对河之东文部夹击，其正面之二师人自然得手，然我军犹能渡河冲出一团余众，终以众寡太相悬殊，结果失败。

失败中的观察

从上面报告看来，我军到处都是胜仗，到处敌人都被我们打败，举例来说：（1）会昌头次击破钱大钧全部，二次击退了黄绍竑全部，然都不追击，使敌得有空暇整顿，到后来再来将我各个击破。三河坝之败、潮州之失守及影响到汤坑我军主力之退却，也可以说我全部失败，都是这次战略上只知后退不知前进，正与战斗原则“只知前进不知后退”矛盾起来了。若当连续将敌击败之时，分头进击，打他个落花流水，使他无空整顿，全部扑灭了他，到广东后我们解决敌之东路军及王俊部，真是最容易的事。（2）入粤时追敌至韶关，敌疲劳不堪，敌不向潮汕退，而向西汤坑退，我军只知强袭潮汕，不去追击，使该敌（王俊之补充一、二、三各团及第一补充团）得到汤坑数日休养，并与敌东路军连合，势力增大，给我军一大不利。若当时在韶关派一师跟踪追击，定可扑灭而无疑。此又一战略上失败也。（3）汤坑之役打了胜仗，又去想救潮州。潮州失了，又绕路三天才走了离揭阳三十里之流沙，终了汤坑失败，敌人追来，只走十里又在流沙包围击破二十四师。本来谁都知道潮州无险可守，我军汤坑战争还没结果，就全部返来救应，两头皆失了利。汤坑、潮州、流沙三方失败是当然的事。若是当时汤坑再有二小时相持，将敌击破，直往海陆丰，再找出路，绝无这样大的损失。这也是战略上的失败。

现保存势力

我来时二十军一、二、三、四、五各团向海陆丰去了。闻得二十五师之七十三、七十五团向福建去了。报纸上登的叶军在闽被人收编，听说乃是朱德收编的民军，七十三、七十五两团想来尚在闽。贺、叶带有千人冲出流沙，但不知到何方去了。

关于七十五团在南昌暴动中 斗争经过报告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于上海)

张启图

二十五师由三河坝败退，复于武平失败，至离江西会昌所属筠门岭四十里处之地（不记地名），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各部由各营连长提升负责，至七十五团全部百余人，共枪八十余支，由图负专责。途经数日，到达南安，由朱德召集会议决，二十五师及第九军，合编为一纵队，朱德充纵队司令，七十三团编为第一路，第九军编为第二路，七十四团编为第三路，七十五团编为第四路，准即日由南安先后分路向各方出发前进，何路得势，即迅速来纵队报告，以便各队集中。如纵队部有妥当办法，亦随调各路来纵队集中，并令一、四两路于即日向湖南桂阳出发前进，纵队部及二、三两路，候南安款项妥当后，亦随出发跟进。图遵即率第四路，随第一路司令肖泽陆，于是日午后，由南安出发，向桂阳前进，并派侦探数组，向各方搜索，按日报告。进至三日，到达聂都镇，得朱纵队司令函示，桂阳有湘军驻在，一、四两路应即改道前进桂东。此时，第一路官兵逃跑殆尽，留存者，不上二十人，由肖司令率领，附属于本路，改道向桂东前进。再两日（不记地名），复得朱纵队司令函嘱，桂东有我们同志何举成组织工农军，声势浩大，该一、四两路，应迅即前进桂东，与何举成联络，纵队部及二、

三两路，准于克日由南安出发，经崇义赶来桂东集中。图合同肖泽陆，继续前进。第二日午后，离桂东沙田三十里处之地，得侦探回报云：沙田有敌人一连驻守，县城并无敌人，当即准备是晚向沙田攻击，直进县城。是晚九时到达沙田附近，侦察地形，分布兵力，于翌日午前四时，向该敌攻击前进。至午前十时许，该敌向桂阳方面溃退，我军因实力不充，子弹告绝，未十分追击，停止于沙田市，休息用膳。随获派赴桂东县城侦探回报云：县城有敌步兵二营，机关枪一连驻扎，并何举成早已消灭。当时因前两日派赴纵队部之传令兵尚未返，不知纵队部行止如何？肖司令遂与图决定计划，改道前进郴州边界之八面山，停止等待纵队长命令方针，于是日午后一时，继由沙田出发，向八面山前进三十余里之处，获赴郴州侦探回报云：有敌人六、七百，机关枪三挺，由桂东绕小道向我军前进。图等遂尽力团结，决于是晚冲过该敌，晋上八面山，再进数里，与敌相遇，鏖战数时，屡冲不过，死伤过半，其势不支，兵心厌战，各自逃生，有窜向江西新田者，有窜郴边者。图等窜于该地附近山上潜伏，俟天明，再想方收集残余，时经两日，不获一人，并不知伊等窜去何方，再无办法，遂偕肖泽陆潜至衡州分路，肖回宝庆，图返湘潭，亦无办法，并受各方拿捕不已。随闻广州暴动之声轰轰，故于本月四日离湘来沪，拟赴粤垣，再图后效。兹除三河坝至江西筠门岭一带，经过诸多亡计〔忘记〕，不能详述外，所有在南安至湘边，与朱德失联络，战斗失败，脱离各情形特此具报。敬呈

钧鉴

七十五团团长张启图上

编 后 记

《南昌起义》资料选辑，由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选编，编辑：皖来。在选编工作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时光同志的帮助。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丛书 南昌起义(资料选辑)

作者 =

页数 = 1000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